

FD &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1年12月号

金融与发展

卡莱斯图斯·朱马：
非洲新的消费者

科利尔论非洲的基础设施

詹瑞论经济繁荣与衰退

改变非洲 中产阶级的兴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Jeremy Clift

主编

Marina Primorac

执行编辑

Camilla Andersen

Hyun-Sung Khang

Natalie Ramirez-Djumena

James Rowe

Si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Maureen Burke

Jacqueline Deslauriers

助理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Seemeen Hashem

美术设计

Nicole Braynen-Kimani

Lijun Li

高级编务助理

Harris Qureshi

编务助理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James Gordon

Nicoletta Batini

Thomas Helbling

Helge Berger

Laura Kodres

Tim Callen

Paolo Mauro

Paul Cashi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drienne Cheasty

Paul Mills

Alfredo Cuevas

Martin Muhleisen

Marcello Estevão

Uma Ramakrishnan

Domenico Fanizza

Abdelhak Senhadji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 版权所有，IMF 2011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5 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特辑

非洲的中产阶级引擎

6 非洲发展的新引擎

非洲正依靠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来推动其经济繁荣
卡莱斯图斯·朱马



12 南非的困境

南非受到高失业率的困扰，同时由于与欧洲联系紧密，目前处境维艰
奥比·艾默·塞拉西

15 直言不讳：增长的质量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速增长及全球贸易往来的扩大，使得贫困家庭也从中受益
安托瓦妮特·萨耶赫

18 建立非洲的基础设施

非洲大陆非常适宜于修建铁路，该地区要建设重要的铁路网络，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关键的决策
保罗·科利尔

22 观点：预防饥荒

“非洲之角”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荒使得利用全球风险管理途径实现粮食安全很有必要
约塞特·施林



24 图表释义：非洲：放眼未来

这片大陆在50年后将是什么样的？
娜塔丽·拉米雷斯—杜莫纳

56 数字聚焦：东非贸易

不断增长的地区间贸易和更低的关税为更加快速的增长铺平了道路
谢莉·温斯顿、卡洛琳娜·卡斯特罗

本期还有

26 角色转换

新兴经济体对债务以及投资热情的依赖程度更低，受不稳定的投资情绪的影响更小，并且正在重新思考资本流动的作用
艾斯沃·S. 普拉萨德



30 土地销售

放松信贷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暴涨暴跌，一个世纪前美国耕地价格可以为其提供一些线索
拉古拉兰·詹瑞、罗德尼·拉姆查兰

34 是否出售？

《僵尸经济学》的作者探讨私有化的利与弊
约翰·奎金

40 修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缺陷

欧元区长期存在需要根本的决策转变
弗洛伦斯·吉莫特

非洲：改头换面

持续的贫困和冲突在非洲很常见，以至于人们很难看到在这个地方还发生着其他什么事情。

2011年4月，刊登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的一篇名为“隐藏真实的非洲”一文记录了当出现严重的饥荒、流行病或武装冲突时，非洲如何轻易地就能登上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然而人们却很少关注其积极的发展趋势以及获得的基本成功。

在多数情况下，即使经济在过去10年加速增长、消费群体中中产阶级兴起以及更具活力的私人部门吸引了当地的企业家，但有关非洲的描述仍然集中于那些不好的消息。

最近，这种现象开始出现转变。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名为《是的！非洲行！》的书，讲述了非洲所取得的成功。同样，位于突尼斯的非洲开发银行对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后50年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将结果集结成册——《50年后的非洲：通往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该研究称，“在过去10年，尽管全球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接连发生，但非洲经济仍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虽然要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还需要几十年的强劲增长，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片大陆的潜力持乐观态度。”

本期《金融与发展》对非洲的潜力进行了探讨，

本期封面上的两位女性肯尼亚人苏珊·奥古亚和雅米拉·阿巴斯共同创办了AkiraChix，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移动电话服务。她们在为IT投资者和科技公司提供的科技中心工作。本期重点文章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卡莱斯图斯·朱马指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改变人们对非洲未来的看法。以西方或亚洲的标准来看，这些中产阶级的消费相对仍然偏少，但长期以来对消除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分散了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资助方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未能认真考虑推动经济繁荣的各种方式，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教育、推动创业精神和贸易等”。

本期“经济学人物”，我们采访了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沙皇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她在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彻底改革。她说，非洲必须弥补浪费的时间，以便在全球化竞争中迎头赶上。

毋庸置疑，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本期的文章讨论了如何改善不好的基础设施和电力短缺问题，以及防止饥荒。

此外，本期还关注了欧元区的前景、新兴市场、大宗商品以及解释了何为计量经济学。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主编

43 贫困人口的保护措施

大宗商品出口国可减少债务，保护其贫困人口
埃文·坦纳、乔治·雷斯特雷波

46 低于表象的价格波动

与大众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大宗商品的价格较工业产品更为稳定
拉巴赫·阿尔扎基、丹尼尔·莱德曼和赵洪岩

50 批评是正确的吗？

一项新研究发现，当低收入国家获得IMF的金融援助时，其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将增加
野崎雅博、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和圣吉夫·古普塔

其他内容

2 经济学人物

再次执掌经济帅印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的采访

38 回归基础

何为计量经济学？

利用一种经济理论并对之进行量化
山姆·奥利阿里斯

53 书评

《伟大的追求：经济学天才传记》，斯尔维亚·纳萨尔

《日食：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生活》，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詹姆斯·鲍顿

57 索引

图片：第4页，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Africa Report, August–September 2011 edition；第15页，Seemeen Hashem/IMF；第35页，Seemeen Hashem/IMF。

摄影：封面，Panos Pictures/Sven Torfinn；第2页，Ramin Talaie/EPA/Corbis；第6—7页，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第8页，Nigel Pavitt/JAI/Corbis；第10页，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第12页，Nic Bothma/EPA/Newscom；第14页，Jon Hrusa/EPA/Newscom；第15页，Eugene Salazar/IMF；第16页，Georges Gobet/AFP/Getty Images/Newscom；第18—19页，iStock；第19页，Christopher Pillitz；第20页，ZUMA Press/Newscom；第22页，Pat Hamilton/Reuters/Corbis；第23页，WFP/Rein Skullerud；第24页，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第25页，Antony Njuguna/Reuters/Corbis；第26页，Bruno Morandi/Hemis/Corbis；第30页，Leroy M. Backus/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Corbis；第30页，Thomas D. Mcavoy；第31页，Getty/Vetta；第31页，Robert Kohlhuber；第36页，Ocean/Corbis；第40页，imago stock & people/Newscom；第43页，STR/EPA/Newscom；第46页和第48页，Maurice Tsa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51页，Jack Kurtz/ZUMA Press/Newscom；第53—54页，Michael Spilotro/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再次执掌 经济帅印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沙皇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的采访



“在未得以解决之前，事情总是显得不可逾越。”

——纳尔逊·曼德拉

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单调的西装革履中，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那身色彩绚丽、极富非洲传统特色的盛装总是能够使她脱颖而出。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常常头戴搭配协调的头巾，再加上她特立独行的主张，使其成为一位极富个性的风云人物。“我感觉自己颇具尼日利亚风格，也很有非洲特色，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她说。

奥孔约·伊维拉来自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其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她以毫无废话的直爽和果敢而闻名，这为她赢得了“Okonjo-Wahala”（亦即“麻烦女人”）的绰号。国内的批评家和立法委员之所以这样称呼她，是因为她热衷于改革。

她被委以统筹部长之职，负责掌管所有的经济部门。然而，重整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绝非易事。鉴于此，她的工作并不值得让人艳羡。每六个非洲人中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从某种切实的角度来说，尼日利亚决定着非洲这块大陆未来的生机与活力。

奥孔约·伊维拉说，非洲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作为非洲国家，若要在这场全球化竞争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加快发展。”

坚韧的谈判者

对于奥孔约·伊维拉而言，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勇挑尼日利亚经济沙皇的重担了。2011年7月，她放弃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职务，回到首都阿布贾。这是她在10年之内第二次回国任职。

去年，作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她通过谈判为国际开发协会（IDA）达成了一笔493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方案，世界银行的这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最贫穷的国家。在朝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这项基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她早前曾任尼日利亚财长，之后不久又任外交部长（2003—2006年）。在她之前，还没有一位女性担任上述任何一项职务。她在首个政府任期内，不遗余力地同腐败和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提高金融透明度，并锐意改革，使这个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更具优势、更能吸引外来投资。2005年，她还与双边债权国达成了一项价值180亿美元的债务免除协议，并使尼日利亚首次获得了主权信用评级。

艰辛和疟疾

奥孔约·伊维拉的适应能力和果决性格源于其童年的成长背景。她的部分童年时光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度过的，后来又爆发了毁灭性的尼日利亚内战，当时，全球各家报刊头条上都充斥着尼日利亚饱

受饥饿和病痛折磨的孩童的照片。

“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相继死去。”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一次采访中，她如是说道。

在内战和军事封锁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300万，其中大部分是因饥饿和疾病致死。奥孔约·伊维拉是幸运的，她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东南部奥瓜希乌库的传统伊博族的统治者（或称奥比）。年幼时，她与母亲卡麦恩在部队的一个流动厨房做工。

她的父亲楚库卡·奥孔约——一位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加入了脱离出去的比夫拉军队并成为了一名准将。“我们基本上是不停地在各地奔波，我的父母亲失去了一切，一切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全部的家当和储蓄。”她回忆道，“我和母亲在哈科特港呆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为武装部队做饭。我们全天的工作就是做饭。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为部队贡献微薄之力。我们整整三年都没有吃过肉。直到那场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才得以上学，因为那时我的母亲建立了一所小学校。”

在内战爆发之前，奥孔约·伊维拉曾和她的祖母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子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的父母正在德国留学。“她十分慈祥，但是要求也十分严格。我必须在上学之前同其他孩子一起从河里取水，此外，还要做家务并和祖母一起去田地里干活。我认为，在农村成长的那段时光和当时所经受的那种专注和约束以及随后在战争中的磨练，让我变得十分坚强，能够忍受极其艰苦的条件。”

奥孔约·伊维拉描述了她在内战期间是如何在母亲生病、父亲又远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挽救了患有疟疾、在死神门口徘徊的三岁妹妹。她背着妹妹走了10公里的路，来到一所教堂的诊所，因为她听说那里有一名优秀的医生。她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诊所外面有上千人，前来看病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对于眼前的情景，她没有被打倒，转而背着妹妹在人群脚下爬行，并最终爬上窗户使妹妹就医。“我知道，如果她得不到医治，就会死掉的。”奥孔约·伊维拉这样说道。

这位医生给小女孩打了一针氯喹并对其进行了补液治疗，数小时之后，她便恢复了健康。这一针挽救了她妹妹的生命。“我背着她回家走的那10公里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短的路程。我当时高兴极了。”她说。

自那以后，她便一直表现出同样的胆识和果敢。

同尼日利亚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

当她被委以领导尼日利亚经济管理团队的重任后，她和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的利比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肖像被登载上了《非洲报道》杂志的封面，被冠以锐意革新的“非洲铁娘子”的美称。

奥孔约·伊维拉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痛击尼日利亚各大港口存在的官僚作风，将那里运营的联邦机构

的数量从14个削减到6个。诸如燃油补贴等此前不可触及的其他领域也在削减之列，但是若要革除贫困、回扣、勒索、管理不善及种族紧张关系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则显得困难重重。

如今，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数百万青年即将步入就业市场。

尽管许多人对她锐意改革的魄力称赞有加，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她决意削减燃油补贴，这样的实例说明她无视普通百姓的利益，因为这些普通百姓是低汽油价格的受益者。

尼日利亚的人口为1.58亿，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及非洲大陆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一半以上的人口依然处于毫无改进的贫困状态，深受电力缺乏、道路泥泞和腐败丛生之害。尽管面临诸多问题，这个国家却拥有非洲最大的电影产业，其产出的影片数量位居全球第二，排在好莱坞之前，仅次于印度。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目前的预算中，首要的重点是安全，其次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还是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阻碍经济体中其他部门运行的瓶颈之一。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大对电力、道路和港口建设的投入力度。”负责协调该国经济规划的奥孔约·伊维拉如是说道。

“最近，我们开始实施了港口改革措施。我们力图降低过往我们港口船只的通行成本，并消除港口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如需要花费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办理货物清关手续。我们力图将清关的时间减少到一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将各个港口机构的数量减少一半，努力应对在港口发生的腐败、勒索和其他事件，以便降低业务经营的成本。”

果断的个性

同事们说，她总是拥有明星般的魅力。197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见专栏1），还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域经济和发展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她入职世界银行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2011年7月（除了2003—2007年，此间，她首次回到尼日利亚，后来任该国顾问）。她在职业生涯的阶梯上获得一步步的提升，最终成为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工作努力，并因自己旺盛的精力和卓越的技术知识而闻名。“在我看来，她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坦白正直的人。”目前任世界银

行非洲能力建设与合作部主管的蒂扬·M. 萨拉赫如是说。萨拉赫曾与奥孔约·伊维拉合写过一本书（见专栏2）。他补充说道：“同时，她也是女士们强有力的支持者”，并指出，她曾努力帮助提升颇有前途的年轻女性在世界银行担任管理职务。她还帮助建立了一项私募股权基金，用于为非洲妇女所拥有的企业进行投资。

她喜欢努力地工作，将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对时间进行灵活的处理。“我是那种喜欢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去机场的人。”她的发言人、前记者鲍尔·恩瓦布依库说。“而她是那种还有5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才出现的人。”他在接受《非洲报道》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其他人对其果断的个性也赞赏有加。“尽管她工作起来极其努力，而且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恩戈齐却始终显得很平静和镇定——从未慌乱过——在世界银行发展部特有的忙碌中，这一点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山塔亚楠·德瓦拉让这样说道。

发展经济学

尼日利亚批评人士称，奥孔约·伊维拉在哈佛受的教育和在国外度过的大量时光已经使其深具西方思维特征，因此，在安全面临压力之下，她也执意实施困难重重的改革。作为一个拥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发展经济学家，奥孔约·伊维拉曾多次负责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众多项目。她说，人们对于发展的理念已经完成了若干阶段的演变。

“我更多地是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世界银行度过的。”在任职伊始她这样说道，她有一种感觉，即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都在现场摆着。“储蓄、投资的全部理论和资本短缺——假如你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国家就能发展。”

“如若这种做法不太起作用，那么注意力的焦点便要转移到能力缺乏的问题上。假如通过技术援助可



以增强能力建设，那么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或多或少地采用的是单纯的解决办法，在解决非洲问题时尤为如此。”

从这一方面讲，由诺贝尔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头所做的“增长委员会报告”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

“必须承认，对于增长和发展的的问题而言，没有任何绝对完美的答案，既存在良好的做法，也存在糟糕的做法，我们应该汲取好的经验，摒弃坏的教训，因此，没有任何包医百病的妙法良方——这种观点虽微不足道，但却十分有用。”奥孔约·伊维拉如是说道。她是委员会中来自全球各地的22个成员之一。该委员会于2008年出版了其最终报告。

但是，某些方面却具有一致性，其中包括对强有力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牢固基础。“如若没有一个稳定而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便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行下去。在实施审慎的基本财政政策和合理的货币及汇率政策方面，存在诸多经验教训——要留意本国的竞争力并把它牢记在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切实、持续地调整相关政策。政策调整并非一蹴而就：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你必须始终坚持这样做，而且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你也必须如此。”

“获得上述经验需要花费数年功夫。”她说，非洲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尤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失去的20年”。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经过那失去的20年之后，非洲国家开始切实地汲取了经验教训，而且这一经验教训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地应对了2007年至今的经济和金融衰退。”

下一个金砖国家？

得出正确的结论已经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走上了一条经济增长的正确道路，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当奥孔约·伊维拉还在世界银行任职时就开始称非洲是诞生下一个金砖国家的所在地（“金砖国家”指几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0—2010年期间，以名义美元价计算，哪个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比巴西和印度的增长

专栏1

偶然选择的专业

奥孔约·伊维拉在哈佛学的是经济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相当偶然。”她说，“在上学时，我在地理方面是个优等生，对于区域性和空间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十分感兴趣。因此，我申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地理学专业。当我和家人一起决定要上哈佛大学时，我认定这是我要主修的专业。”

令她震惊的是，当她来到马萨诸塞州后发现，哈佛大学并没有地理学专业。

“当我向一些老师描述我的兴趣时，他们说，能符合我兴趣的、最接近的专业是经济学，就这样我便学了经济学专业。我学完这个专业之后，又考取研究生院的区域经济学专业。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如今已被大家遗忘的瓦西里·列昂惕夫（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现在依然在用的社会核算矩阵。”

她所有的四个孩子也都曾在哈佛攻读。

速度更快，且根据 IMF 预测，在 2010—2015 年间，其增长速度将超过巴西？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0 年 5 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做的演讲中，她这样说道。

为了将金砖国家的愿景变成现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需要以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该解决方案中还包括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她说，正如尼日利亚的情形一样，缺乏完备的基础设施是阻碍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洲糟糕的道路、港口和通信设施使其无法融入全球市场，此外，其内部的边界限制将这一地区分割成了无数个小规模的地方性经济体。这样，既不能实现区域一体化，也不能实现全球一体化。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奥孔约·伊维拉建议，大的捐助国可以在纽约市场上发行“非洲发展债券”，以实现融资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发行此类的债券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对非洲经商环境的看法。面对安全无忧的 1000 亿美元的融资，全球的私营公司将会竞相为非洲提供基础设施。”她这样预测道。

奥孔约·伊维拉预测，随着采取更好的基础性经济政策，非洲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对此，我们无意夸大事实，但是你绝对可以发现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前景使人们可以谈及投资和购买消费品，正是基于这个牢固的基础，这块非洲大陆可被视为投资目的地。不仅对于出口如此，而且对于消费市场而言也同样如此。假如你看一看非洲电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么你会真切地体会到，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在尼日利亚，我们如今拥有的电话数量已达到 8000 万部。我们仍记忆犹新的是，就在约 11 年前，我们拥有的固定电话仅仅 45 万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业务的经营方式。也在改变如今和未来的发展模式。”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她认为，私人部门的增长将会为创造就业岗位奠定基础。“如今，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假如你看一看非洲大陆的人口特征就会发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50%—60% 人口的年龄不超过 25 岁。鉴于此，有数百万青年即将步入就业市场。”

促进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法之一便是鼓励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外非洲人回归祖国。“作为一个散居国外的人，你不能等待一切都可行、经济改善了、安全无忧了才考虑回去。你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回去。”

“我们需要他们回来，因为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他们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牢固基石和中流砥柱。例如，尼日利亚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在美国工作，但尼日利亚国内却十分缺乏符合资质的医护人员。”奥孔约·伊维拉说道，“我们时常需要将病人送出国接受治疗，所以这些医生为什么不能回来建立医院呢？我们为什么要

专栏 2

齐努瓦·阿切比——“我心目中的英雄”

当奥孔约·伊维拉一家在华盛顿特区居住时，她发现没有一本可供大儿子阅读的有关非洲英雄的励志书籍，于是她决定自己写一本。这本书的写作耗时八载，围绕著名的尼日利亚作家和活动家齐努瓦·阿切比展开。

“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孩童及至青少年时，就十分钟爱非小说类的自传作品，但是我所能找到的全部都是关于美国和英国英雄的书籍，没有一本是有关非洲英雄的。”于是她便与冈比亚经济学家和作家蒂扬·萨拉赫合作，撰写有关颇具影响力的非洲人的系列作品。

但是，第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迄今只写了有关阿切比的一本书。阿切比是 1958 年出版备受赞誉的尼日利亚英文小说《瓦解》的作者。“他是一个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介绍非洲文化的作家。”奥孔约·伊维拉说道，“我认识他本人。他是一个能够讲述我们自己故事的非洲人——他的讲述方式简单而直接，同时又不乏优雅。”

萨拉赫说，在这本书开始发售的那天，他接到了已经退休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电话，问及恩戈齐活动的举办地点。“我知道恩戈齐的魅力和影响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如是说道。

奥孔约·伊维拉的儿子佐丁玛·伊维拉是《没有国界的妖兽》的作者，该书描写了一个西非儿童士兵的遭遇。

Sallah, Tijan M., and Ngozi Okonjo-Iweala, 2003, Chinua Achebe: Teacher of Light (Trenton,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浪费宝贵的资源将重症病人送出国呢？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技能。”

与此同时，人才接受国需要确保回归祖国的非洲人受欢迎且不被人嫉妒和猜疑。

无畏者的游戏

对于奥孔约·伊维拉而言，回到尼日利亚令她感慨万千。“回来后让人有一种归属感，感觉很高兴，但同时也让人颇为沮丧。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们的总统是真正想变革的人。”在提到今年 4 月赢得了总统大选的古德勒克·乔纳森时，她这样说道，“但是我们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要面临诸多挑战。我们正致力于许多需要纠正的项目。尽管如此，只要存在政治意愿，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逐个地解决问题。”

“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真的很多。他们不会毫无反抗地允许你做任何事情。而且他们反击的方式不一定干净而爽快。”她说道，“他们在互联网上编造有关我的各种故事，要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攻击我。他们的目的要么是把拉下台，要么是毁坏你的名誉，因为我们正在力图纠正一些东西。所以这并非是一场令人愉悦的游戏。这不是一场脸皮薄或肚量小的人的游戏。”■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是《金融与发展》的主编。

非洲发展的新

卡莱斯图斯·朱马

目前，整个非洲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就是拥有手机的人数。根据2011年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尼日利亚和博茨瓦纳分别有71%和62%的成年人拥有手机，而加纳和肯尼亚的这一数据也达到50%以上。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非洲的手机使用量增幅位居全球首位。根据英国Informa Telecoms&Media公司公布的数据，2011年年底，非洲已成为继亚洲之后世界手机拥有量第二大的地区，手机用户数达到6.16亿人。

当然，作为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的手机普及率仍然是最高的。不过，在整个非洲地区，各国都竞相发展科技，将创新和移动连接普及至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开启了手机银行业务，并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屋顶咖啡馆。

引擎

非洲正依靠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来推动其经济繁荣

各大银行和零售企业在看到非洲手机市场所取得的成功，纷纷面向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以寻求在非洲扩张其业务。根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提供的数据，非洲大陆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成果之一是中产阶级数量的显著增长。

非洲开发银行（AfDB, 2011a）指出，非洲中产阶级的数量将继续增长，预计将从2010年的3.55亿（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人口的34%）增至2060年的11亿（占42%）。中产阶级对于非洲未来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良好的综合因素

自非洲各国取得独立后，非洲大陆便一直面临一系列似乎连续不断的发展挑战，包括内战和政治上的

不稳定性、旷日持久的粮食安全问题、旱灾、疾病、普遍存在的贫困和腐败问题等。

不过，近年来非洲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更好的经济政策、政府管理以及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加之更加友好的营商政策，以及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非洲商品更为强劲的需求，使得非洲地区持续保持高增长率，并未受到全球衰退的影响。

非洲开发银行在其名为《50年后的非洲》（Africa in 50 Years' Time）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0年间，尽管全球接连出现粮食和金融危机，非洲地区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要解决非洲地区的贫困问题仍需要发展数十年，但人们对非洲的发展潜力日益乐观。”

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贫困问题将成为一个长期严酷的事实：预计到2060年，非洲1/3的人口仍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街头晨景。

将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每日生活费用不足 1.25 美元。

对于外界而言，帮助每日生活费用仅在 1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具有难以抗拒的象征意义。然而，强调援助并不能鼓励非洲地区尽量提高其经济发展效益。从关注贫困到转向关注经济的逐步繁荣，标志着对非洲未来经济发展的看法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而对该地区的政治和实际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对消除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分散了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资助方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未能认真考虑推动经济繁荣的各种方式，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教育、推动创业精神和贸易等。

如何定义中产阶级？

要界定中产阶级的含义，或者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47 个非洲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级，这并非易事。不过，我们所指的中产阶级是介于非洲大量贫困人口（日均生活费用不足 2 美元的人口）以及少量富裕精英人士之间的一类群体。

按照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的标准，此类群体的人口并非中产阶级。不过，按照非洲的标准，他们拥有可支配收入，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水平。其年均收入在 1460—7300 美元之间。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洲的中产阶级数量稳步增长。1980 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占其总人口的 26%，为 1.11 亿。1990 年，这一数字增至 27%，达到 1.96 亿。2010 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超过其总人口的 1/3 (AfDB, 2011b)。

根据新兴市场投资银行复兴资本公司 (Renaissance Capital) 近期对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布贾和哈科特港这三座城市所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非洲的中产阶级绝

大部分都很年轻，处于人生的奋斗阶段。其中近 70% 中产阶级的年龄在 40 岁以下。在电冰箱、冷冻机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市场中，大约一半的需求来自于中产阶级。这种消费需求还延伸至其他行业，如住宅、家居装饰、交通和休闲等产业。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非洲的消费支出将从 2008 年的 8600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4 万亿美元。沃尔玛等主要消费品连锁零售企业决定进军非洲市场，这也体现了全球对中产阶级将推动非洲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预计到 2030 年，非洲部分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将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主要国家。这些中产阶级的年支出将达到 2.2 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支出的 3% 左右。

整个非洲地区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尽管很多原有的问题仍然存在，如严重贫困、基础设施差、出现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饥荒等，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崛起，这为非洲大陆这一古老的土地创造了众多新的机会。

推动这一转变的因素很多，包括有助于本地增长的商业环境、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增加，以及有助于带来更多增长机会的全球化新因素。

商业环境和创业精神

与各国促进增长的政府经济政策一样，由本地企业家引领的私人部门的强劲发展推动了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本地企业家及时采用新兴技术，将进一步带动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例如，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为年轻人提供全新的商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绝大部分的非洲劳动力仍将在非正式部门就业，从事生产效率低、工资待遇低的

工作。即便正式部门的就业年增长率达到 10%，但在 2020 年前非正式部门所占的比重仍将高达 60%—70%。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流血事件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从卢旺达的现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非洲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状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景的激励下，卢旺达的年轻人正在利用最新的技术开创新的业务。

2010 年，卢旺达基加利科技学院的克拉丽莎·艾利巴基扎和其他工程专业的学生创办了移动应用开发公司 HeHe 有限公司。该公司最初是为学生们提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培训课程——“加快信息技术创新”课程，旨在促进创业精神和软件相关的业务开发活动。HeHe 公司是设法利用电信基础设施，特别是宽带设施不断发展这一机遇的众多卢旺达新建企业之一。

类似的新建企业在非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比如，在肯尼亚，众多新成立的企业将最新的信息技术引入娱乐、通信、教育、农业和服务等各种领域。

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印证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力。2009 年，毛里求斯 Seacom 公司开通了一条总投资 6 亿美元的海底光纤电缆，通过非洲东部海岸实现了南非与欧洲之间的网络连接。Seacom 前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赫利希指出，该电信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了另外 60 亿美元在陆上光纤方面的投资，用于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建设“国家骨干网”、城域网和移动通信塔。

Seacom 公司 76% 的股份由非洲投资者持有，这表明境外资本和技术可以在特大项目中利用本地的投资资本，推动中产阶级的业务开发和增长。下一步，Seacom 公司将帮助非洲地区迈入云计算等基于宽带的业务。

今后数十年内，商业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更加重视基于本地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通常作为创造力中心的都市地区。新的中产阶级将出现在那些提供创新和创业机遇的工业和农业产业集群。目前在宽带等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促进经济活动的连接性、移动性和集群效应。

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知识中心也将成为新兴非洲中产阶级大量涌现的地方。比如，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新兴计算机工业区伊凯贾等地可以看到这种萌芽，而新兴的知识产业，如尼日利亚的电影制作网络（“尼莱坞”，Nollywood）将产生大批新兴企业家，从而形成非洲下一代中产阶级的生力军。

地区市场

除了推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源外，目前非洲正在快速促进地区一体化，旨在创建更大的非洲大陆市场。

在这方面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举措是 2011 年 6 月启动的非洲“大自由贸易区”（GFTA）的谈判——该“大自由贸易区”涵盖从利比亚、埃及到南非的整个非洲地区。

拟定的非洲“大自由贸易区”将把现有的三大贸易集团，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EAC）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融为一体（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数字聚焦：东非贸易”）。

根据倡议者的设想，非洲“大贸易自由区”将涵盖非洲 26 个国家，累计 GDP 将超过 1 万亿美元，消费群体估计将达到 7 亿人。这一巨大的市场将对境内外的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本地工农业的发展，但大量投资将来自海外。目前，有关建立三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

贸易集团的扩大有助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据估算，在非洲现有三大地区贸易集团间的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带动下，26 个成员国的出口额已从 2000 年的 70 亿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320 亿美元以上。

这些举措基于东非共同体持续不断的一体化努力，包括建立海关联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和政治同盟等。东非共同体的五个成员国（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总人口为 1.35 亿人，累计 GDP（按现有市价）约为 800 亿美元，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目前，非洲地区正在就建立货币联盟进行谈判，以便推动和维持完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稳定性。谈判力求考虑到欧元区的局限性，将有关财政一体化和金融稳定性的条款纳入其中。该货币联盟如果按照设想获得通过，将使非洲首次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性经济体，从而将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消费支出以及中产阶级的发展。

迎接投资挑战

非洲内部的贸易受到非洲大陆基础设施（主要在能源、交通、农业灌溉和电信领域）建设薄弱的限制。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路网络总长度约为 3100 公里，而国土面积仅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4 的法国，其公路网络总长度则接近 100 万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有效参与非洲大资源贸易区的能力将取决于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速度。

在未来 10 年间，整个非洲地区如要满足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所需要的资金将接近 5000 亿美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建立非洲的基础设施”）。目前，为弥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非洲很多国家已开始实施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塞内加尔正在改善其能源、道路和机场基础设施，以便将本国打造成为



南非索韦托，一对夫妇正用手机拍照。

一个地区性商业中心。

非洲经济增长及其中产阶级数量的相应增加，部分取决于贸易量（特别是与不断发展的新兴市场间的贸易）的增长所带动的国际投资的增加。200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为100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突破1100亿美元；2000年，印度与非洲的贸易额为30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增至700亿美元。不过，这种联系也存在风险：由于非洲总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向中国的原材料出口，因此很容易受到中国制造业出现波动的影响。

除了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对社会投资的迫切需求外，要弥补非洲大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距，还需投入巨额的资金。

散居国外者的支持

随着非洲大陆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非洲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推动这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人群可能将是那些大量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尽侨民之用”）。估计这部分人口的数量为3000万以上，他们将成为潜在的投资来源。

到目前为止，这个多元化群体的主要影响力是通过这些散居国外者寄回家的汇款来实现的——估计每年的汇款额约为380亿美元。加之那些未记录的汇款额，累计汇款额可能接近600亿美元。这些汇款绝大部分用来支持移居国外者在其本国的家人的生活开支，这一数字令非洲大陆每年获得的25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也相形见绌。

不过，目前非洲散居国外者已日益成为推动中产阶级增长的一个重要投资资本来源。

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正帮助建立新一代的大学，这些高等院校不仅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能力，还促进

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其中一个范例是加纳的艾社思（Ashesi）大学，该大学由前微软员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毕业生帕特里克·阿乌阿创办。该大学旨在培养“富有道德、具有创业精神的非洲下一代商界领导人，培养其卓越的治学态度、领导力和公民权利”。

即便在非洲相对更为贫困的地区也有类似的进展。比如，在1991年索马里军事独裁者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垮台后宣布独立的北部索马里兰，就一直主要依靠其散居国外者创建其高等院校。首先创办的大学是Hargeisa大学，随后Burao大学、Amoud大学、索马里兰科技大学以及Gollis大学相继建成。

连接性和移动性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散居国外的非洲公民对中产阶级兴起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和西非之间直航的开通使得流入该地区的投资更为便捷。在美国新泽西地区制药行业工作的加纳公民开始投资其本国的卫生保健行业。类似的投资和贸易往来也将推动西非中产阶级的发展。

培养创业能力

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在提供企业家所需的本地知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大学往往更强调传统的教育功能，而非技术和创业技能。第一代非洲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后殖民时代的公务员；不过，那些即将离开的殖民地管理者并不愿将非洲公民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人才。即便经济发展要求更加强调技术和商业技能，但上述传统教育方法仍成为了新成立大学的教育模式。

不过，随着非洲开始投资于新建和改建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带来了增强该地区人员在项目设计、实施和维护方面能力的机会。而该地区的能源、交通、农业灌溉和电信项目又进而为开展技术培训奠定了基础。

这些专科大学通过体验式学习方法将理论培训与实践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在无需改革现有大学的前提下使得高等教育的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其中一些现有的大学可以自愿采纳这些新的教育模式。

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已有此类大学。比如，埃及、加纳和肯尼亚已经成立了专门面向电信行业的专科大学。此外，非洲不同的出口商品（如矿产品和农产品）形成了一个很长的价值链，为在不同领域开展课程开发和教学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有待开发的课程包括咖啡、巧克力、茶叶、花卉、铜和钻石制作等课程。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已在卢旺达建立了分校，开展技术和创业技能的研究生培训，这将使卢旺达成为该地区的技术中心，并同时服务于其周边国家。

城市增长中心

中产阶级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的日益发展，而城市化将推动发展和创造性的人口聚集在一起。

在联邦领导人退居内地寻找到新的政府首府所在地后，尼日利亚前首都拉各斯一度成为“死城”。如今，一方面由于该市政府领导有方，但更主要是由于拉各斯居民的创业精神以及中产阶级作为经济推动力的崛起，使拉各斯的经济又重新焕发生机。

目前，接近 20% 的拉各斯居民属于尼日利亚新兴的中产阶级。根据复兴资本公司近期开展的调查结果预计，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中产阶级将大幅推动本地和国际市场对制成品的需求。

利用城市发展潜力的一种途径是将城市重新定位为创新中心。比如，拉各斯近期成立了“创新咨询委员会”，旨在支持政府为提高其技术和创业活力所做的努力。该委员会的主席由国家科技部长担任，其主要职责是从传统的支持研究转向重点强调推动创新。

该项转变将大大有利于增强中产阶级在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推动农业变革的可能性

不过，新的技术行业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并非只是促进非洲地区增长的唯一源泉。非洲农业也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非洲的农业发展实际出现了倒退。自 1960 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了 145%，但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粮食产量比 50 年前还下降了 10%，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的投资不足。

例如，化肥施用量极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公顷农业用地所施用的化肥仅为 13 公斤，大大低于北非地区的 71 公斤。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 24% 的谷物生产使用的是良种，大大低于东亚地区 85% 的比例。

缺乏养分投入已导致非洲地区土质的急剧下降，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5% 的耕地因为过度利用而出现退化。整个非洲仅有大约 4% 的农作物得到灌溉，远低于南亚地区大约 40% 的比例，这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容易受到世界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新知识和新技术以及当地灵活的技术、资源和经验将有利于开发出众多新的本地产品和服务、利用技术创新、鼓励创业精神、增加农业产量、建立各种市场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加工和存储水平的改善，将有助于稳定农业市场和推动农业创新。

粮食价格的上涨已激发了外国投资者对投资非洲农业的兴趣。2011 年初，亿万富翁阿穆迪 (Sheikh Mohammed al-Amoudi) 旗下的粮食开发公司沙特明星

农业开发公司 (Saudi St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宣布将于 2020 年前在埃塞俄比亚投资 25 亿美元，用于水稻生产。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各个企业将在该国的低洼地带耕种此前闲置的耕地。埃塞俄比亚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 300 万公顷的耕地租赁给私人投资者。目前，埃塞俄比亚的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 7400 万公顷，但其中仅有 1500 万公顷得到耕种。将闲置的土地用于耕种是该国实现其推动农业发展和扩大中产阶级人群目标的第一步。

拓展新的机遇

全球化的要素，如贸易相互依存性、连接性和移动性，为非洲提供了全新的增长机遇，也为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贸易开启了新的发展潜力。

全球化的要素，如贸易相互依存性、连接性和移动性，为非洲提供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十多年前便已启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变革也为非洲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曙光。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方面的投资将为技术型企业提供为推动经济繁荣所必备的发展活力。此类企业的兴起将反过来激发金融行业的创新，推动国内风险融资活动的增长。

随着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非洲各国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基础设施、技术培训和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投资于消费者将为整个非洲地区带来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中产阶级。■

卡莱斯图斯·朱马 (Calestous Juma) 现任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开发实务教授兼科学、技术和全球化项目主任，著有《新丰收：非洲的农业创新》一书 (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参考文献：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2011a, Africa in 50 Years' Time: The Road Towards Inclusive Growth (Tunis, September 11).

——, 2011b,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AfDB Market Brief (Tunis, April 20).

The African Executive, 2011, "Nigeria's Middle Class Exudes Growth and Optimism," October 5. Available at www.africanexecutive.com/modules/magazine/articles.php?article=611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0, 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 (Seoul, San Francisco, London, Washington: McKinsey & Company).

Robertson, Charles, Nothando Ndebele, and Yvonne Mhango, 2011, A Survey of the Nigerian Middle Class (Lagos, Nigeria: Renaissance Capital, September 26).

南非的困境

奥比·艾默·塞拉西



在南非开普敦古古乐土社会福利服务办公室外排队等候的南非人。

南非受到高失业率的困扰，同时由于与欧洲联系紧密，目前处境维艰

南非，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本应成为非洲发展的驱动力。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非洲大部分国家仅受到相对温和的影响，经济增长已经复苏，但南非仍然增长乏力。

在历经 2003—2008 年初相对强劲的增长之后，2008—2009 年期间，南非经济急剧衰退。同时，与其他绝大部分的大型新兴市场（见图 1）所不同的是，南非的经济复苏一直举步维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未完全复苏。

例如，南非的私人部门投资和出口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更为糟糕的是，该国的工作岗位大为减少，数目之巨令人震惊——其失业状况与处于全球经济危机中心的国家的失业状况相仿。在经济衰退的两年之后，仅有少部分的工作岗位得以恢复。上述影响使得南非本已居高不下的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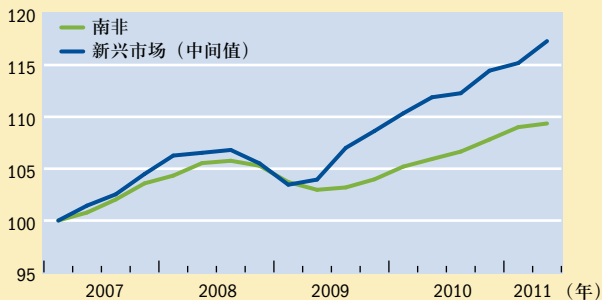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南非的经济复苏不仅对本国 5000 多

万人口，而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人口也至关重要。南非在该地区的经济地位类似于德国在欧元区在经济地位。此外，南非的企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展了大量的投资，投资的行业涉及金融、零售和电信行业，而这些行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

三个因素，即冲击、政策和体制，是导致南非经济复苏疲软的主要原因。

图1
停滞不前，复苏乏力
南非的经济复苏速度滞后于其他新兴市场。

（实际GDP指数，2007年第一季度=100）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

三大冲击

在过去的几年间，南非接连遭受了一系列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是第三大冲击，也是迄今为止一系列冲击中最具破坏性的。其他两个冲击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负面冲击是始于2007年的电力匮乏。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未能投资于新增发电容量，以及临时的供电中断问题，这导致南非这一发展较为迅速的经济体的许多部门被迫急剧减速。由于这种冲击的突发性，使得企业措手不及，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调整。此外，这种冲击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企业将被迫支付更高的电费才能新增发电容量。而在新增发电能力正式投产前，企业将难以扩大投资，尤其是在采矿等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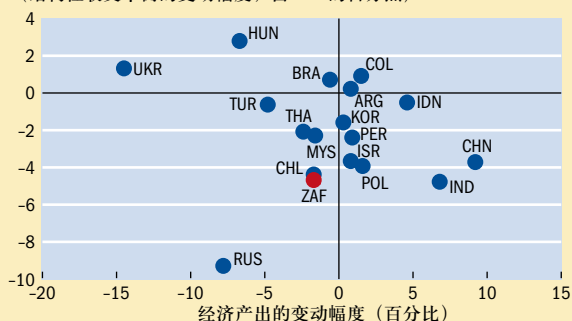
在南非电力匮乏开始之际，全球食品和燃油价格也开始飙升，南非的通胀率急剧攀升至大大超过南非储备银行（SARB）规定的3%—6%通胀目标区间的水平。为应对物价上涨的局面，南非储备银行大幅提高其政策性利率——2006—2008年，提高了大约5个百分点。上述因素是导致南非2008—2009年期间经济增长放缓的第二个原因。

南非经济遭受的第三大、也是最后一个冲击是全球金融危机，它对南非造成了尤其巨大的破坏性，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业已困难重重的南非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其二是该危机及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席卷了欧洲和美国，而这些地区是南非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主要目的地。

图2
支持性作用

2008—2010年，南非财政刺激措施的支持力度超过绝大多数的新兴经济体。

(结构性收支平衡的变动幅度，占GDP的百分点)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

注：ARG=阿根廷、BRA=巴西、CHL=智利、CHN=中国、COL=哥伦比亚、HUN=匈牙利、IDN=印度尼西亚、IND=印度、ISR=以色列、KOR=韩国、MYS=马来西亚、PER=秘鲁、POL=波兰、RUS=俄罗斯、THA=泰国、TUR=土耳其、UKR=乌克兰、ZAF=南非。

上述这些多重冲击及其剧烈程度部分解释了南非当前经济举步维艰的原因。然而，采取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措施是否有助于缓解这种冲击？或者说，现有的体制，特别是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通胀目标制的政策框架，是否加剧了上述冲击的影响？

采取合理的政策

财政政策如何才能起到更好的支持作用，这一点难以确定。南非的财政收支账目占GDP的比重从2007/2008年期间的1¾%盈余转变为2009/2010年期间的6½%赤字。自此以后，南非的财政赤字便一直居高不下，尽管仍属于可控范围，但导致其债务负担大量增加。

无可否认，财政赤字的不断加大主要体现了其税收的收入下降，而非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增加。即便通过被动接受税收收入下降的方式，政府也为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得到支撑。此外，如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快速扩大公共投资也已被证明难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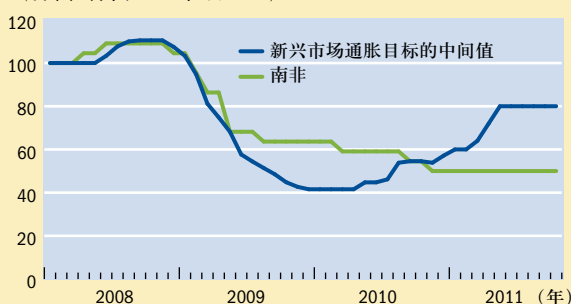
将结构性的财政收支平衡（针对商业周期影响进行调节的财政收支平衡）的变化与经济产值的下降（见图2）进行对比，是评估财政政策对策的另外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也表明，这一时期南非的财政刺激措施是可比国家类别中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同样，也很难评估货币政策的适宜程度。目前，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经济产值和通胀的演变方式，不过在南非储备银行确定利率时还必须依赖预测数据。评估对策的方法之一是将南非的货币政策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与财政政策一样，南非储备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与其他类似的大型新兴市场具有可比性（见图3）。在其他新兴市场的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时，南

图3
宽松货币政策

为应对其经济复苏疲软的状况，南非储备银行一直将其政策性利率维持在低水平。

(政策性利率；2008年1月=100)



资料来源：哈沃分析（Haver Analytics）。

非储备银行已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低水平的政策性利率，这一点与南非经济复苏疲软缓解了其通胀压力相一致。

总体而言，当受经济衰退影响时，南非转向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且一直相应地保持这种方式。由于南非的利率周期逐渐趋缓，此前看上去似乎还有进一步调低利率的空间，但由于此前的通胀和工资增长水平一直偏高，使得南非央行继续采取逐步宽松的政策。

对南非宏观经济框架的争论

南非经济复苏乏力引发了人们对其经济政策整体决定因素的争论。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通胀目标制体系以及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结构，受到了人们的指责。通常，很难将经济产值的短期波动归因于体制框架等变化缓慢的因素，不过冲击和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经济产出。

南非一直非常灵活地实施通胀目标制体系框架，正如此前所指出，在遭受经济危机影响时，南非储备银行至少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多次调低银行利率。不可否认，缓和周期开始时南非的政策性利率相对较高，不过南非的通胀率也相对较高，此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此外，IMF非洲部即将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南非受到经济衰退影响时，南非央行明显更加关注经济产值而非通胀水平。

然而，如果没有通胀目标框架，南非仍然能够保持较低的银行利率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最近几个月，南非的政策性利率水平是30多年来最低的，甚至低于2000年引入通胀目标制前的主要利率水平。

南非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加值得关注。即便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南非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数年间，其失业率也大大超过20%。南非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市场也高度集中化，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市场缺乏竞争。

在劳动力市场，众多结构性因素，如种族隔离导致的人口中心和经济活动中心在地域上不匹配，加之技能匮乏，是导致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原因之一。而产品市场的问题源于政策因素（比如管制性市场进入障碍）和自然因素（地域分布）。

考虑到该因素，似乎更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可以减轻上述各种冲击对南非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市场的表现非常糟糕：自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以来，集体议价便更加强调工资而非生产力，工资的实际增幅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水平，导致很多行业的就业人口大幅降低；而各个企业由于处于垄断



南非约翰内斯堡，失业者成为非正式的“拾荒者”。

性产品市场，其定价能力和利润率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工资的实际高增长加剧了南非的失业问题。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工会指出，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从1999年的50%降至2007年的43%左右。他们认为，必须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上述发展趋势近期部分逆转的状况（由于2009年实际工资增长和GDP萎缩所致）。不过，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企业更加青睐于资本密集型生产而非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这体现了劳动力相对成本增长的状况。

劳动力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也可以间接反映出过去10年间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影响。这使那些对劳动力依赖性相对较小的行业从中受益，包括技术原因。最后，自2000年以来，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并非只是南非的特有现象。而在受国际竞争影响的行业，如制造业中，南非的劳动力收入比重实际上出现了显著增长。

采取行动

导致南非当前经济困境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外部因素，但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并且这两种市场的无效性也并不是没有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并以就业增长作为其核心目标，2010年年底，南非政府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即“新增长路径”，这种路径认识到了必须更好地保持生产力增长和工资增长的一致性。此外，南非政府还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主要行业的反竞争活动。其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全新战略能否取得成功。■

奥比·艾默·塞拉西（Abebe Aemro Selassie）是IMF非洲部助理主任。

增长的质量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速增长及全球贸易往来的扩大，使得贫困家庭也从中受益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开局不俗，至少数据显示如此。多年以来，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即便在全球经济放缓时仍然如此。低收入国家表现尤其好，不仅其人均收入稳步增长，通胀总体得到了抑制，债务水平得到了降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也大量增加。

然而，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这种增长的质量。特别是，这种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吗——贫困人口和年轻人能够从中受益吗？——这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吗？

目前，我们已获得有关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包容性增长的部分有利证据。在绝大多数的国家，贫困人口的比例一直不断降低，更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以及健康和教育指标得到改善。不过，对于贫困人口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是否达到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程度（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非洲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了解得并不多。同时，我们也不清楚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实际的增长。了解这一点，对于非洲地区可能至关重要。在该地区，部分国家的人均收入自 2000 年以来已增长了三倍多，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均生活标准则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在最近的全球衰退期间，非洲低收入国家表现出了出色的抗跌性。其经济增长仅仅短暂地小幅放缓，并未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贸易崩溃的太大影响。非洲增长质量的最终检验指标应该是该地区的每个人，特别是青年，能否参与创收活动或者获得生产性就业机会。不过，近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非洲地区的贸易伙伴能否表现出足够多元化的繁荣发展，以便在更加动荡的全球环境下保持对该地区

产品和资源的高需求并实现需求的不断增长。

为了更好地了解非洲地区增长的质量，IMF 非洲部分析了近年来有关两大因素的证据：首先，该地区最为贫困的家庭是否确实从普通民众的消费增加中受益（特别是那些增长最为快速的经济体）；其次，从传统的西方贸易伙伴转向新兴市场的贸易方式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IMF，2011 年）。

增长惠及穷人

为评估非洲地区最为脆弱的群体是否享受到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我们详细分析了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六个相对典型的较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活动和特征的调查信息。样本当然相对较小，并且未涵盖主要石油出口国或者脆弱国家，不过我们深入分析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变化与每个国家的增长具有何种关联，并分析了这些国家使贫困人口脱贫（通过其消费水平来进行衡量）的因素。

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样本中的四个增长相对较高的国家（加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中，相对贫困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在 2000 年年初出现了强劲增长。相比之下，两个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喀麦隆和赞比亚的贫困家庭在消费水平的变化方面表现不佳。

在所有六个国家中，每个家庭中一家之主的教育水平最为重要。如果一家之主拥有大学学历，则整个家庭的消费水平会依次超过那些一家之主为中学学历、小学学历或者根本没接受正规教育的家庭。此外，那些在服务行业（私人或公共部门）工作的家庭，其消费水平通常超过那些在制造行业工作的家庭，



安托瓦妮特·萨耶赫
(Antoinette Sayeh)
现任 IMF 非洲部主任。

更是大大超过了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家庭。城镇家庭的消费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家庭，即便考虑到农村居民粮食自给自足以及地区差异情况时也是如此。

不过，样本国家的细分人群在该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保持或增加消费支出的方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某些国家，最为贫困家庭的支出上涨幅度是所有细分人群中最高的（或者下降幅度是所有细分人群中最低的）。而在其他部分国家，相对富裕家庭的表现最佳。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了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当人均经济增长率提高时，最贫困的 25% 家庭的支出就会增加；其二，当属于最贫困的 25% 家庭的支出增长时，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的人口数量就将减少。换句话说，贫困家庭确实也分享到了增长带来的好处。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在那些增长最为快速的国家中，其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幅度也最大。

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最贫困的 25% 人口表现特别突出的国家在农业就业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在提高增长的包容性方面，农业收入似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在我看来，根据个人经验以及最近分析研究工作的结果，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社会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这一点明确无疑。同样，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这一点也非常明确。经济增长必须创造适宜的就业类型，并带动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长期强劲增长。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学校教育以及经验的获得对于整个社会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必不可少。

至少在中短期内，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主要有两大途径。第一，通过农业创收机会，通过这种机会，绝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街头，顾客正在购买用进口小麦制作的法式长棍面包。

大多数的贫困家庭能够获得收入来源，例如通过推广生产率更高的耕种方法（如施用化肥、采用良种）以及建立适宜的基础设施（公路、电气化、灌溉）；第二，经济援助必须针对最为弱势的家庭。有关贫困最为相关的要素调查信息有助于确定那些处境最为困难的家庭。

贸易和投资方式的转变

在一定时期内，农业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创收来源。不过，该地区出口目的地及其进口和外商投资来源的不断转变，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些转变可能最终导致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生产力和稳定性发生重大调整。这些转变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质量最为重要，可能显著促进该地区未来的就业潜力。

在过去 10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和其他经济联系已从传统的西方国家合作伙伴转向亚洲、拉美和中东欧的新兴市场，并对其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这方面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中国已明显增加了在非洲的经济参与度。仅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就从一个在非洲无足轻重的国家，一跃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商品，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的主要接受国；该地区进口商品，包括消费品和其他制成品的主要提供国；以及该地区的主要投资国。亚洲、拉美以及中东欧的其他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巴西——也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该地区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明显增加。

这种新增往来只不过反映了该地区贸易迅速发展这一事实。该地区的增长已经足以让各方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不过，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统贸易伙伴相比，新兴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已经明显攀升。在过去 10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面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出口比重从 70% 降至 50%。在此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非石油出口国和石油出口国的降幅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进口比重也从 60% 降至 40%。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发展趋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那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方式从发达经济体贸易伙伴转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将对该地区的增长质量带来何种影响？

更小的波动性，更多的发展机会

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往来是一个重大的有利因素。通常，多元化发展有助于降

低风险。目前，该地区受某个特定国家或市场突发事件的影响相对更小，从而可以抑制外部需求发生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有利于形成可能更为长期持久的增长。技术转让和创新的渠道得以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愿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推动本地的发展，受益于进口价格降低以及出口市场附加值增加的机会增多，目前利用该地区相对优势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述要素通过多种方式发挥作用。该地区波动性的降低表明，在近期的全球衰退以及随后的缓步复苏过程中，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事实上，长期以来，来自非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的需求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出口增长，从而缓解了资金流入和投资减缓的局面。如果没有这种稳定因素，该地区受到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将要大得多。

技术转让的增加主要是对内投资更加多元化的结果。由于新兴市场投资者在各种行业——不仅是自然资源行业，还包括制造业、农业、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些投资者正在扩大专业技术知识（包括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起作用的专业知识）的传播。很多参与企业都是其各自领域的重要创新者。

目前，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承担着更为重要的援助和发展任务，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转型模式。专门面向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多，正促进较低收入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同台竞技的能力。

最后，该地区在贸易伙伴方面的更多选择使其能够获得更低成本的原材料和消费品，从而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进行外包是该地区那些自身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日益转向更高附加值生产的新贸易伙伴的一个选择。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外部市场可以进一步增强专业化水平，并相应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地区一体化可以增强所有这些流程的影响。

警示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存在众多吸引人的机遇，但并非没有风险。例如，有人担心新兴市场可能带来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掠夺该地区的自然资源或者剥削低收入工人或消费者。显而易见，在过去的时期内，部分国家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使其容易受到剥削。同时，全球化可能影响社会的优先关注领域，增加该地区受到动荡不定的海外市场影响的风险。不过，为应对强大的全球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很多方法。

首先，改善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管理应成为该地区众多国家优先考虑的手段。外商投资者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关注与日剧增，这应该引起各国政府官员的足够重视，如加强自然资源开采过程（招标、合同、税收）的健全管理，以及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等（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出口和收入波动所带来的影响）。为使该地区获得的净效益最大化，援助接受国必须审慎评估提供援助方的建议书，并考虑拟定项目对本国国民收入的影响以及是否针对基础设施或本地发展提供了援助。

贸易更加多元化所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将产生赢家和输家。更低成本的国外供应商将抢夺部分企业的生意，而部分工人的技能也将“无用武之地”。不过，如果没有过渡时期的这些代价，这些国家就无法转向日益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群提供部分支持，帮助他们适应这种转变。但是，如果抵制这种转变，比如通过有选择性地干预经济或者控制进口，就只会弄巧成拙且代价高昂。

我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全球往来迅猛扩大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关注。我认为，这将鼓舞该地区的发展。

展望未来

我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全球往来迅猛扩大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关注。我认为，这将鼓舞该地区的发展，并为该地区的包容性发展和结构转型以及获取更加多样化和低廉的消费品和服务带来众多激动人心的潜在机会。

要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潜力，并确保所带来的增长是优质增长和惠及大众的增长，该地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自助。首先，该地区的各国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维持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开放市场。其次，各国必须审慎管理好该地区宝贵的自然资源，重视农业的需求。最后，该地区必须继续关注于人的能力建设——通过改善医疗卫生和提供优质的教育水平——以维持一个素质良好、灵活多变的劳动力群体。

如此，非洲的高增长才能惠及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人。■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 "How Inclusive Has Africa's Recent High-Growth Episode Been?" Chapter 2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October).

建立非洲的基

保罗·科利尔

非洲大陆非常适宜于修建铁路，该地区要建设重要的铁路网络，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关键的决策

未来的 10 年可能成为投资非洲的机会。从全球范围来看，可投资的私人资本数量庞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前景黯淡，而在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即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其未来前景似乎更不明朗。尽管非洲未能完全摆脱全球风险的影响，但其持续增长可能将取决于该地区进一步发现资源的潜力，以及其巨大的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农业用地的商业开垦潜力。

新建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有效利用上述两大潜在的增长点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设施形式：铁路。

非洲大陆的陆地面积巨大，非常适宜于修建铁路。然而，在过去的 50 年间，非洲从未大规模铺开的铁路网络却出现了收缩。而在国土面积巨大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美国，每 43 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拥有 1 公里铁轨。相反，人口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人口的 1/5、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尼日利亚，每 262 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拥有 1 公里铁轨。尼日利亚的情况非常典型：通过大幅降低交通运输成本，铁路可以为非洲广大的地区带来众多经济发展机遇，特别是在该地区很多国家未来增长所依赖的农业和采矿方面。非洲大陆必须在铁路网络领域开展为期 10 年的大量投资。

政治因素

从技术上讲，铁路建设几乎没有什

么困难。铁路技术是最为古老的工业技术。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铁路网络的匮乏主要是政治因素带来的结果。尽管铁路建设从技术上看比较简单，但在政治上却非常复杂，其根本原因有以下三点：

- 铁路是网络产业的一个主要例子。网络产业的主要特征是其运营相互密切相关，如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运营将更为有效。在此，公共政策的作用便更加凸显：如何按照公共的利益来管理垄断提供方。

- 铁路是固定成本相对于运营成本比例偏高的一个经典例子。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边际成本（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通常大大低于平均成本。从社会效率方面来看，价格应该基于边际成本进行设定，但要使一项活动在商业上具有可行性，价格必须至少等于平均成本。这种定价上的矛盾，要求必须找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案：通常要么由政府提供补贴，要么由那些对价格不

基础设施



太敏感的用户向那些依赖于低廉铁路服务的用户提供交叉补贴。

• 非洲大陆地区分为很多国家，因此铁路线路不可避免地必须是国际性的，尤其是由于很多受益最大的国家往往是内陆国。然而，各个国家政体可能使跨国铁路网络的投资面临危险。事实上，每当列车经过边境时，这种宝贵的资产就将流入一个新的管辖区域。

不过，由于非洲各国政府尚未应对上述三大政治挑战，非洲的铁路网络仍然不足。

组建一个网络产业

铁路并非唯一的网络产业。电话服务和电力供应也是重要的网络产业。在非洲，电话网络通常由私人部门提供，但同时受到监管；电力网络通常由公共部门提供，作为公共专营服务进行运营。从理论上讲，铁路网络可以在上述两种模式下运行。不过在非洲，公共部门拥有并管理铁路网络可能并非最佳选择。非洲各国政府还有其他众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为铁路网络（包括新建或改建的铁路网络）的巨大成本“买单”。此外，非洲各国政府的资金因为主要投入其核心职能的管理方面而捉襟见肘，因此其他一些次要的任务主要由私人部门来负责组织。

坦赞铁路局（TARARA）管理的坦赞铁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示。坦赞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负责修建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之间的铁路。然而，如今这条铁路几乎无法发挥作用。由此可见，

只是修建铁路还不够；铁路必须得到良好的管理，并且与潜在的商业用户实现对接。目前，非洲的很多国家政府可以通过交换采矿特许经营权来获得更多的此类由中国修建的铁路融资。不过，授予采矿特许经营权意味着将非洲有限的财富抵押给别国，必须审慎从事。

非洲的特殊需求表明，铁路网络必须是受到监管的私人垄断性质，资金和管理专业知识都应来源于私人企业。不过，监管可能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不可能预测出所有的不测事件：仅仅向公共部门的铁路监管者提供一套获得同意、有待实施的规章制度并不够。为应对无法预料的情况，监管者必须拥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然而在非洲的治理环境下，此类自主裁量权可能扼杀掉私人投资。由于该地区腐败现象严重，即便一个清正廉洁的监管者的决定也可能遭到受贿的指控和猜测。一旦监管者有权制定可能令铁路公司或其客户破产的铁路交通运输价格，就不会有人愿意冒险投资。

幸运的是，目前有了切实可行的、替代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国内监管者的替代方案，即国际争议解决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需由各国政府、投资者和客户批准。这是一种标准的国际合同执行方式，事实上也是在中国的境外投资者和在非洲的中国投资者通常使用的一种方式。这些委员会的记录总体不错。尽管经

常发现这些委员会有背离政府决策的行为，但对政府决策的遵从度仍然很高。在进行投资前，一国政府、国际铁路投资者和铁路商业用户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各方满意的协议，并在其中包括一条有关在出现争议时提交此类流程处理的合同条款，从而将这一方式正式确立下来。



一辆火车正驶离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差别定价

如上所述，由于铁路投资的固定成本非常巨大，边际成本往往大大低于平均成本。这通常会为采取国家所有制的观点提供论据，因为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为铁路网络的固定成本提供补贴，使得用户的价格保持在边际成本上下。此类低定价策略的重要性并非只是假定。尽管铁路网络的建设可以使大量利用不足的土地用于经济上可行的农业用途，但可利用土地的数量可能很容易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

尽管边际成本定价策略将非常有利于开发非洲农业，但目前非洲各国政府尚不能为此类补贴提供资金。事实上，即便某国政府能提供此类补贴，由于政府长期可信度有限，也可能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潜在的铁路运营商和潜在的商业性农场都不会相信政府提供长期性补贴的承诺。

除监管外，还有其他一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同用户之间的差别定价就是其中之一。对价格敏感的用户可以仅仅支付边际成本，而对交通运输成本相

对不敏感、利润更高的行业可以支付更高的费用。非洲铁路网络有两类主要的潜在用户，即采矿业和商业性农业用户。

很多新发现的自然资源将远离沿海地区，需要很长的铁路网络才能将矿石资源运输至海港。如果没有这些铁路网络，大量的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将毫无商业价值。非洲在经济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以何种方式组织铁路网络，才能满足采矿业和农业的需求。

采矿作业必须具备铁路和海港的支持。即使没有农业用户，这些采矿企业也有能力用采矿获得的部分高利润承担铁路网络的费用。只要这些铁路网络为农业和资源开采行业的用户服务，农业用户就仅需支付铁路运营的边际成本。事实上，采矿业和农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异，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化定价提供了可能性。

那些急于开发丰富资源的采矿企业已主动提出修建此类铁路，尽管这些企业不欢迎或者不愿意对铁路网络进行多功能利用。采矿企业通常习惯于专用服务。如果对农业用户的定价接近于边际成本，采矿企业服务于其他用户将会是一件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不过，对于政府而言，多用户铁路网络最为适宜。尤其是北非地区发生暴动后，目前非洲大陆最为紧迫的工作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现代采矿业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并且往往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当地人群可能单独从采矿中得到的直接效益很少。不过，商业性农业生产可以为小型农场主创造大量的付酬就业机会——大部分人将从因资源开采得以实现的铁路网络中受益。

铁路的运营者

这种多用户铁路基础设施尽管有吸引力，但其组织要求也很高。谁来负责铁路的运营？如上所述，如果铁路对农场的服务以边际成本定价，采矿企业无论就其基本能力还是本身意愿而言，都无法运营这类铁路。因此，即便采矿企业愿意提供此类铁路服务，由于此类服务对采矿企业来说属于次要性质，农场主也可能不信任采矿企业的服务。此外，资源不能突然就被发现。一家铁路公司可能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所有未发现矿山的独家经营权。其他采矿企业如果必须依赖于这个单一的铁路公司来运输其矿石，就可能不愿开采这些资源。在此情形下，政府未来在采矿特许经营权方面的议价能力将大幅降低。

不过，正如此前所讨论的，政府监管可能也未必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拥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核心能力，但没有采矿权益的第三方商业运营商似乎是最可靠的选择。所有的铁路合同将包括一份基于差异

化定价的与政府和商业用户签署的协议——如果发生争议，将提交争议解决委员会处理。该协议将确保自然资源开采的高利润能弥补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而对农业用户仅按照边际成本进行收费。

此类合同可以为铁路公司募集修建铁路网络的充足资金所必须的根本保障，确保资源开采企业获得的收入能够收回最初的投资。反过来，这将打消资源开采企业的疑虑，确保铁路服务不会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而商业性农场也能够确保在交付产品时支付较低的运输成本。

必须建立一个政府间铁路管理局，并授予其与铁路公司及其商业用户之间开展诚信谈判的足够权力。

国际间铁路线路

在很多情况下，非洲的铁轨必须经过其他国家的国界。例如，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马拉维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要修建到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铁路，都必须经过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同样，修建从拥有大量珍贵矿产资源的几内亚东部到沿海地区的铁路，最为有效的线路是通过利比里亚。然而，在过去的50年间，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未能保持必要的政治合作，使得这些跨国铁路线路未能发挥其作用。

如果铁路线路成为跨国线路，定价问题则更加复杂。例如，自然资源可能位于一个国家（铁路转运点），而绝大部分待开发的农业用地可能位于另外一个国家。此外，由于很多的产品（包括矿石或农产品）用于出口，海港的垄断地位使海岸所在国的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海港收费从而使仅局限于铁路收费的定价协议失去作用。另外一大难题在于列车经常要跨越不同国境的问题。除非建立一个诉诸法律的协调方式，否则发动机和机车不能作为申请贷款的附属担保品，这将使融资成本高企。最后，由于铁路运输的商品要跨越不同国界，缓慢或欺凌式的海关流程使得这些商品的运输很容易出现延误。因此，各国政府必须作出可靠的承诺，维护被运送商品的自由流动。

要使跨国铁路线路在商业上切实可行，必须在谈判之初就考虑到投资者和客户的风险问题。事实上，所参与的各国政府必须就合并主权的有限但明确界定的程度提前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建立一个政府间铁路管理局，并授予其与铁路公司及其商业用户之间开展诚信谈判的足够权力。显而易见，建立此类管理局的

决定并非在各国交通运输部长们的权限范围之内，而是操纵在各国总统和议会的手中。

未来之路

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冷落之后，各国政府接受采矿企业的主动请求来满足铁路投资的需求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方案。尽管这将毫无疑问地带来铁路的修建，但也将导致两类隐性成本。首先，一旦某个采矿企业拥有铁路网络，其他采矿企业将不愿依赖这一铁路网

络，这将使得铁路网络的建设者在未来的资源勘探方面拥有巨大的议价能力。各国政府往往倾向于关注短期利益，而采矿企业已学会从长计议。其次，采矿企业对修建多用户铁路的兴趣不大。他们往往倾向于将低价值的农业用户视为麻烦。相反，各国政府特别热衷于确保铁路网络服务于多类用户。在谈判过程中，采矿企业无疑会宣扬他们愿意为所有人提供综合全面的铁路服务，但此后，如果采矿企业以发现所谓的不利于修建多功能铁路的实际情况为由而改变做法，政府就可能会进退两难。

非洲各国政府在急于进行采矿协议谈判的过程中面临错失历史性机遇的风险，这种历史性机遇就是改变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主干线。非洲地区以往在铁路供给方面的困境并非是由于资金匮乏，而是来自于政治设计的不足。由于铁路属于网络产业，不能用竞争或监管（由于非洲政府治理方面的不足）来阻止铁路的建设。相反，解决方案应是將争议提交争议解决委员会处理。由于铁路建设拥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要实现社会效率，必须对价格敏感的用户提供补贴。不能由经济困难的政府提供补贴，而应通过差异化定价来提供补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非洲的铁路主干线必须是跨国线路，这可能导致各国之间出现争端和货物滞留，抑制私人投资。不过，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具有决策权的亚区域铁路管理局来加以应对。

突破非洲地区地理障碍的机会，已摆在非洲当代政治领导人的面前。他们必须为此作出错综复杂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这事关非洲大陆经济福祉的前景。俗话说，有备无患。■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是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兼主任。



预防饥荒

约塞特·施林

“非洲之角”
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荒使得
利用全球风险管理途径实现
粮食安全很有必要

有关那些瘦骨嶙峋、双目无神、几近枯萎的孩子们的影像已经逐渐从我们的早报和晚间新闻节目中消失了。然而，在我撰写这篇文章之时，“非洲之角”仍有1300多万人亟需援助。

仅在索马里南部，旱灾、国内冲突以及缺乏人道主义援助，使得该地区300万居民处于危机之中。如果不能让人道主义援助自由进入该地区，数万人可能因此丧生。饥荒的根源并非由于该国的政治结构和体系失效，而是由于政治结构和体系的完全缺位。

最近在访问该地区的过程中，我与无数女性进行了谈话。她们告诉我，她们来自那些不知名的地方，那些位于索马里南部的村庄没有基础设施、没有社会保障网络、没有援助计划，她们长途跋涉来到援助中心，被迫抛下她们的孩子活活等死，只有那些身体足够强壮的孩子才能忍受住旅途的煎熬，最终到援助中心获得维持生命的援助。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内战以及60年来最为严峻的旱灾之后，索马里居民正面临着没有食物的艰难选择：要么远走他乡，要么活活饿死。

当前东非地区所发生的这类旱灾可能无法预防，但饥荒是可以预防的。国际社会拥有预防我们在索马里部分地区所看到的“死亡之路”的相关手段。在那些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地方，数百万饥民正获得维持生命的援助。我们无法阻止未来将会发生的旱灾，但实施长期的应对饥荒的解决办法，涵盖粮食安全的各个层面——从为小农户提供支持到建立应对饥荒的社会保障网络计划，再到为最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非洲风险共担机制——将建立应对危机的适应能力，并作出及时的响应。

第一个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2008年的粮食危机，导致此前已接近30年保持稳定的粮食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1969—2004年，粮食供应量前所未有的日趋增加以及粮食价格的降低使得饥民的比例下降了40%。然而自2008年以来，粮食价格和供应的风险和波动性成为新出现的常态。

很多国家，包括“非洲之角”的那些国家，缺乏国家粮食储备等应对此类波动性的缓冲手段。

在发展中国家，大约80%的人未加入社会保障网络，无法确保在危机期间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营养，从而被迫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环境、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为了不让动荡不定的粮食价格和粮食供应危及那些生活在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区中亟需帮助的人们，我们必须通过利用全球风险管理途径增强粮食安全。

如同其他面临巨大风险的体系一样，粮食安全体系也必须在建立和支持有效的社会保障计划方面进行投资，通过收入转移和补贴防止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跌至特定的贫困线以下，使得他们及其家庭避免受到未来危机的影响。

显然，目前“非洲之角”的旱灾形势非常严重，而该地区亟需生计援助的人数可能要高得多。目前，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政府伙伴计划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450万居民可以受益于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

索马里一名男孩手捧盛有米饭和豆子的碗。



通过一个被称之为 MERET 的社区适应计划，埃塞俄比亚政府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和雨水收集计划，已显著提高了该地区的粮食产量，缓解了旱灾所带来的影响。

在乌干达北部干旱的卡拉莫贾 (Karamoja) 地区，当地社会已经表现出了比 2007—2009 年旱灾期间更大的适应性，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新建了一个社区粮食储备体系，可以在丰收年份补充粮食储备。在肯尼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一个学校食物供给保障网络为超过 67 万名儿童提供食物，帮助东北部旱灾地区的家庭渡过难关。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实施的“购粮促发展” (Purchase for Progress) 计划，通过从小农户手中购买粮食，帮助他们与各个可靠的市场实现对接。其结果是提高了农业产量，并改善了其商业技能。2010—2011 年，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保障网络计划，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当地购买了接近 25000 公吨的玉米。即便在“非洲之角”，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通过在当地采购的粮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目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合作，利用整个非洲大陆多元化的自然气候风险，开发另外一个风险管理工具。该项工作得到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国际发展部以及世界银行的支持。该项目名为“非洲风险能力项目” (African Risk Capacity Project, 简称 ARC 项目)，这是一项非洲灾害风险融资机制，旨在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后，负责立即向参与国家的政府提供物力支持。

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非洲国家共同防范其旱灾风险，整个“风险池”中的资本需求量将仅为每个国家分头进行储备所需资金成本的一半，从而使整个非洲的风险池成为保障非洲粮食安全的一个有吸引力的融资机制。2011 年年初，在“非洲之角”，当明确得知雨季再一次无法如期到来，紧急局面正在形成的时候，此类融资机制当时即可以使参与国的政府有效地利用资金。ARC 项目将有助于减少与融资有关的实施延误，确保为最脆弱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最大限度降低对其他重要国内计划的破坏程度。

目前，在其他方法失效后，紧急干预措施仍是维持生计粮食援助一项有力的后备计划。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最近开发的营养食品，或称之为“聪明食品”，在应对“非洲之角”的营养不良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

在巴基斯坦，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利用当地出产的鹰嘴豆开发了一种高强化面糊食品。目前，类似



约塞特·施林 (Josette Sheeran) 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

聪明食品的开发工作在埃塞俄比亚也在展开。此类速食辅助食品包括了基本的营养成分，其生产也可为当地社区创造就业和创收机会。这些富含能量的食物无需水、烹饪或冷冻，正用于拯救“非洲之角”无数饥民的生命。

应对脆弱性是可行的。在索马里多洛 (Dolo)，我偶遇营养严重不良的 Sadak，他才 18 个月大，和他的母亲已经奔走了 14 天，从索马里中部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地区寻求食物。他的营养状况严重不良，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活

不长了。不过，在接受治疗，包括食用用花生制作的速食辅助食品 Plumpy' Sup 五周后，Sadak 重新恢复了健康。他那圆润的脸庞和开心的笑容证明了在拯救生命方面的投资得到了回报。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中的研究证实，那些在从在母体内到两岁期间的前 1000 天中没有获得充足营养的孩子面临大脑发育不良和永久性损伤的风险。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两个长期的经济问题，将降低个人的创收潜力，削弱各国的人力资本。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泛美开发银行和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在拉美地区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营养不良将导致占 GDP 6% 的平均经济损失。对于那些营养不良负担最高的 36 个国家而言，占 GDP 平均 6% 的经济损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 GDP 损失将超过 2600 亿美元。

不过，与应对营养不良投资的巨大回报相比，上述损失也相形见绌。世界银行估计，在上述 36 个国家的营养干预措施方面每年投入 103 亿美元，将避免 110 万儿童死亡，将严重营养不良流行率降低一半，并将发育不良的儿童数量降低 3000 万。

我们必须反对那种认为一切都无用的怀疑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不仅是人道主义者的职责，也是各国财长、总统和总理们的职责。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地看到，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其他领导人已将粮食安全问题纳入“20 国集团”的议事日程。IMF 承诺将对突发事件作出及时灵活的响应，这是未来全球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风险管理开展合作所迈出的又一重大步骤。

各国共同合作致力于长期应对饥饿脆弱性问题，将确保如同 Sadak 这样的儿童不会为全球、各地区和各国的混乱无序状况而付出代价。整个世界拥有相关的知识和工具，不仅可以预防饥荒的发生，还能从现在开始终结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状况。这不仅事关怜悯和同情，也事关在拯救生命的同时创造涵盖整个供应链的就业机会，并且控制相关风险。■

非洲：放眼未来

这片大陆在50年后将是什么样的？



南非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广场上的一家餐馆。

在过去 10 年中，尽管全球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接连发生，但非洲经济仍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虽然要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还需要几十年的强劲增长，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片大陆的潜力持乐观态度。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大陆（以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说）。非洲开发银行（AfDB）的一项新报告显示，如果增加对非洲青年以及增长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非洲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和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增长与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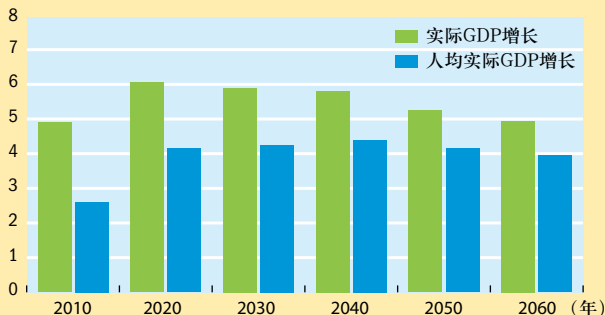
该报告基于当前经济表现的推断预测，非洲经济产出和人均产出将在2010—2060年间持续增长。到那时，大多数非洲国家（预计其人口将在2060年达到27亿，其在2010年时的人口为10亿）将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过去20年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得非洲中产阶级（定义

为每天收入达到4—20美元的人）的规模迅速扩张。中产阶级还将继续增加，从2010年占非洲人口的34%升至2060年的42%。相反，预计贫困率也将下降。每天生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所占比重将从2010年的44%降至2060年的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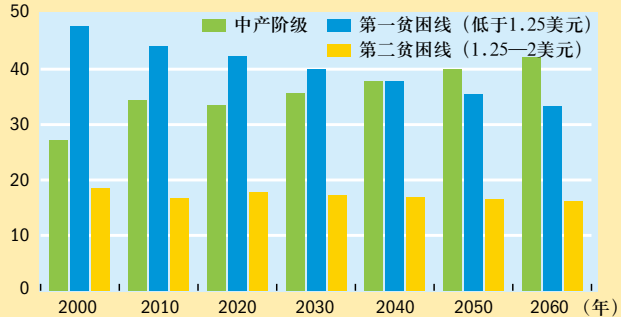
预计非洲将在2010—2060年以至少5%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

（百分比）



预计中产阶级将增加，贫困率将下降。

（占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50年后的非洲：通往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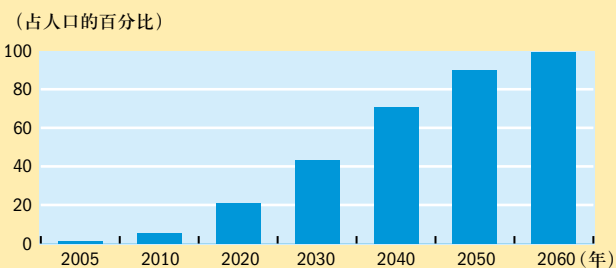


肯尼亚内罗毕市中心一家超市内购物的人。

科技与教育

非洲需要大量的投资，以确保其在未来50年间的可持续强劲增长。几乎所有基础设施行业都需要投资，如交通、通信、水、卫生和能源供应。在过去5年中，宽带普及率得以恢复，这要归功于非洲大力发展相关行业所作出的努力，并且预计在2060年将使99%的人口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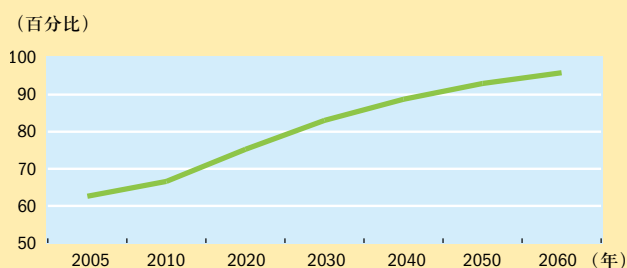
预计宽带普及率将稳步上升。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50年后的非洲：通往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要想从新科技当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技术熟练员工是接受新技术和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产品所不可缺少的。非洲开发银行表示，在非洲，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持续增加，识字率预计将在2060年达到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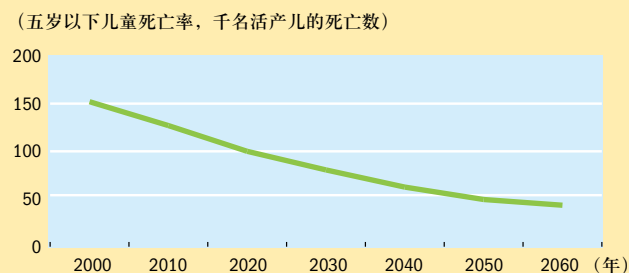
当前识字率的上升趋势预计还将持续。



健康与死亡率

非洲已在改善其人口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预计该趋势还将持续。儿童死亡率预计将从2010年的127人/千名活产儿降至2060年的45人/千名活产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更高的收入、水供应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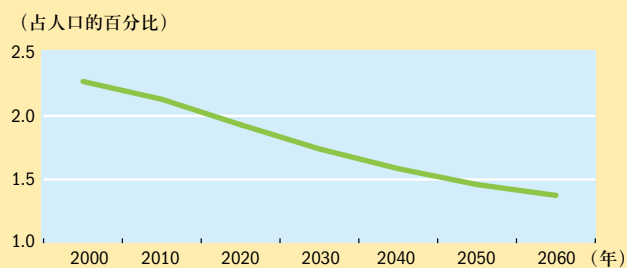
预计非洲在降低儿童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将取得成功。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50年后的非洲：通往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预计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HIV/AIDS) 感染率也将稳步下降，这得益于HIV预防计划和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改善。然而，疟疾仍然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存在，并且将继续成为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HIV/AIDS感染率将持续下降。



本文由娜塔丽·拉米雷斯-杜莫纳 (Natalie Ramirez-Djumena) 撰写，基于由Mthuli Ncube领导的非洲开发银行员工小组所著《50年后的非洲：通往包容性增长的道路》(2011年9月出版) 一书。



角色转换

艾斯沃·S. 普拉萨德

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家纱丽工厂。

新兴经济体对债务以及投资热情的依赖程度更低，受不稳定的投资情绪的影响更小，并且正在重新思考资本流动的作用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

多数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速度更快、幅度更大，而发达经济体依然处在漫长的经济下行当中。

此外，与过去全球金融风暴会导致国内外投资者撤离市场，最终引起经济加速下滑不同的是，今天新兴经济体对资本外逃表现出更多弹性。对外国资本依存度依然极高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为数极少。土耳其及一些东欧的新兴经济体对外国投资者投资热情转移依然非常敏感，但这些国家属于例外。其实，巴西、印度等国家用于海外市场的投资数额要高于本国引进的外国资本，这些国家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可以应对外资撤离。事实上，新兴市场近几年面临的困境是资本涌入。

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会在长时间后回流，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会激发大家探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利益与风险。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已经被视为一种破坏力量，增加了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引发破坏性危机，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或通过增加投资机会分散风险。此文所描述的这种转变表明，新兴经济体此时可能从资本流动中得益，但也面临一系列新风险。

金融联系更加紧密

新一轮经济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过去10年中加速增长，随后被金融危机突然打断，新兴经济体已经基本上加强了其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从它们日益增长的国际资产负债来看，就能探知一二。

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总量不断增加的话，尽管其资产负债平衡，也会加大风险。如果一个国家国际资产负债较多，货币波动，即使国际投资者动作不大的投资组合再平衡都可能导致净流量增加（一国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间的差额）。如果经济遇到压力，资本流入可能中断，同时资本流出增加，导致对净流量受到双向夹击。

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以债务相对于资产净值为形式的负债与资产比重——或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在资产方面有持久风险，或者是投资者只追求经济回报的投资组合。如果涉及权益因素，国内外投资者的风险会更高。尽管总额日益增长有主要影响，也需要仔细考虑外部资产负债的结构，因为这对经济增长和波动都有重要意义。

资产负债表变化

一国的国际投资头寸（IIP）主要是其资产负债表状况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资产负债表中一边为一国的外部总资产，另一边为本国的外债。资产和负债类别分居资产负债表两边。分析主要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可以解释全球金融结构的显著变化。

新兴经济体的外债曾经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债务，而现在主要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证券投资组合（见图1）。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组合已经占到了新兴经济体总负债的一半以上（见表）。五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即“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

印度、中国、南非），其情况正是如此。对于巴西、中国和南非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约占外债的2/3。相反，发达经济体外债主要为债务组合（如公司发行的债券）和银行贷款。

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几年中，新兴经济体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变化非常显著。2000—2007年，仅外国直接投资一项负债就占有所有负债增长的近一半。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债务共占外债增长的70%。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短期外债以外币计价曾是问题根源。这些国家不仅面临对国际投资者失宠后无法对债务再融资的问题，同时也面临本国货币贬值的问题，那样就增加了本国货币成本。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资产投资组合是更理想的资本形式，这些国家的债务逐渐由本国货币来计价。当这些投资因为本国条件或（和）货币贬值遭受损失时，外国投资者也会承担部分资本和货币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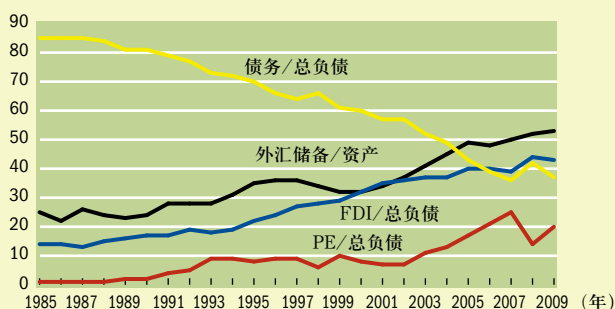
新兴市场资产状况发展也非常有趣，资产状况也越来越以外汇储备为主。这些资产主要为四个主要储备货币区域（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发行的主权债务。一般来说，到2010年年底时，新兴市场外部总资产的一半为外汇储备（见表）。中国和印度的外汇储备占本国外部总资产的2/3。

2000—2007年，外汇储备积累占新兴经济体外部资产增长约一半。不仅仅是中国，大部分新兴市场经

图1
资源发生变化

以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债主要是债务，但现在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

（占总额的比例，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Philip Lane和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的工作成果的计算。

注：外国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组合（PE）以及债务是以占总外部负债的百分比来表示。外汇储备是以占总外部资产额的百分比来表示。

扩展

到2010年年底，一半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债模式相对较为稳定，主要为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

	FDI/负债	PE/负债	FDI和PE/负债	外汇储备/资产
发达经济体				
中间值	19.7	9.9	31.4	1.2
组平均值	14.9	13.6	28.5	3.0
新兴经济体				
中间值	40.5	8.2	56.2	38.8
组平均值	6.4	14.5	60.9	52.7
主要新兴经济体				
巴西	36.5	33.3	69.8	47.1
中国	63.2	8.8	72.1	69.0
印度	32.5	18.5	51.1	67.9
俄罗斯	38.6	17.5	56.1	36.6
南非	41.5	35.0	76.5	13.4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中间值表示该组各国数据的中间值。当外国投资者在资产方面有持久风险时，会转向外国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组合（PE）是购买股票证券以获得金融收益。负债和资产是指一个国家的外部负债和外部资产。

济体在这几年其外汇储备占外部总资产的份额都在增长。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是干预外汇市场防止本币升值的副产品，因为本币升值会降低贸易竞争力。但外汇储备也扮演了雨天基金（rainy-day fund）的角色，对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提供了自保。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总资产和债务头寸的增加使得新兴经济体对防御性储备需求出现上升。实际上，这些经济体的累积外汇储备在2007年时达到峰值，在危机期间有所放缓，但最后又再度增加（见图2）。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负担急剧上升，使得这些资产处于危险当中。结果，新兴市场的外部资产负债表反常地转移到资产一方。

自保变得昂贵

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在寻找安全资产，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的供应是由全世界的净政府债务轨道所驱动的。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公共债务水平大幅攀升。自2007年以来，全球净公共债务的增加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无论是绝对量还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以下是使用来自IMF的数据及预测得出的统计（均以市场汇率计）：

- 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总量将从2007年的18万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30万亿美元，到2016年时将继续增长至41万亿美元。而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到2016年时债务总量为7万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了2万亿美元。

- 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将

从2007年的46%增加到2011年的70%，到2016年将增长至80%。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在2011年时为21%，以后会逐年下降。

- 2007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25%，占世界债务总量的17%。到2016年，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份额为38%，占世界债务总量的份额为14%。

- 2011年，四大主要储备货币区共占全球GDP的58%，占全球债务的81%。

从对世界债务和世界GDP增长的贡献来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比更为明显（见图3）。

- 2007—201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世界债务增长的9%，预计将占2011—2016年增长量的13%。而其对这两个阶段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6%和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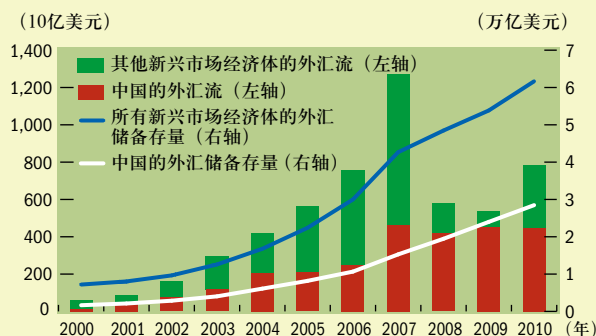
- 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债务攀升的贡献远远大于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美国在2007—2011年全球债务的增长量中占37%，预计将占2011—2016年增长量的40%。而其对在这两个阶段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8%和18%。

这些数据预示，将来的情况比较糟糕。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面临的公共债务负担较重，增长前景惨淡。如果放在人口低水平增长、快速老龄化、医疗成本及其他必要开支上升的背景下看，其增长前景更为惨淡。

图2

积累外汇储备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中外汇储备积累放缓，但现在又开始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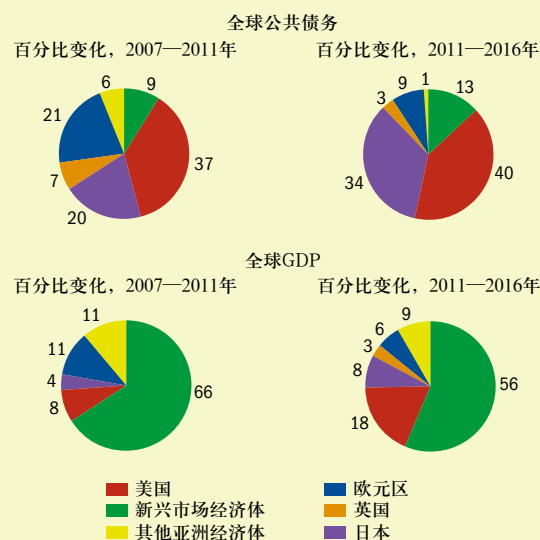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组成数据库，2011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

注：外汇流指每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左轴）。外汇存量指年底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右轴）。

图3

位置发生变化

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石。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数据的计算。

注：该图揭示了各国或国家组对全球净政府债务及全球GDP绝对水平变化的贡献百分比（以市场汇率下通用货币计量）。

储备货币经济体以本国货币发行主权债务，将货币风险转嫁给了购买其主权债务的外国购买者。此外，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的债务水平将会挤出私人投资，降低发达经济体相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而生产率差距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于发达经济体货币最终将升值，导致财富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转移。

财富转移呈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新兴经济体积

富的金融市场会提高新兴经济体吸收资本流入，有效管理资本流动的波动。例如，企业债券市场提供了投资机会有助于吸收资本流入，并将资本有效分配至生产活动中而非投机活动中，而企业债券市场在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规模非常小。另一方面，资本管控的不合理通常会增加经济扭曲，在阻止资本流入潮中的持续价值很小。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扩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扩大加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国内渠道，符合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

累了外汇储备后会寻找自保，最终推高了保险的成本；发达经济体财政挥霍，且因为加剧了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而扩大了全球风险。以美国为例，官方及私人外国投资者约占净公共债务的一半。

发达经济体主权资产到底有多安全？由于诸如美国等“安全避风港”的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引发了新兴市场投资者对这些债券安全性的担忧。当然，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且交易量很高。这就意味着在全球金融风暴中流向美国国债的资金主要是冲着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较强、更为深化去的，而不是出于安全考虑。

未来之路

通常，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赖外来资本以及其外债结构而面临着许多风险。但是今天，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新兴经济体只有少数几个，且这些国家多数都有大量的国际储备。以外国货币计价的短期债务问题也显著减少了。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了灵活的汇率体制，也不必过于担忧货币崩盘的问题（见 Kose 和 Prasad，2010 年）。

新兴经济体不断融入世界金融市场，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多政策溢出效应以及震荡传播等风险。但这些风险相对于国内风险较为温和。的确，许多新兴经济体面临流动性充裕的问题，这些国家强劲的增长预期会带来资本大量流入，给国内通胀、资产价格上涨以及汇率等带来很大压力。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由开放外国资本引起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资本流动增加了国内政策的难度。资本流入会推动国内信贷繁荣以及资产泡沫，以至于后来泡沫破裂。资本流入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升值压力也影响了收入分配，通过增加通胀、破坏工业增长等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更为丰

大加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国内渠道，符合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这些国家之间可以互相投资，不像现在这样要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积累买单。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积累，放开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

新兴经济体应关注如何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而不是依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通过其自身的政策选择，它们为发达国家树立了榜样。发达国家应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及结构性改革，而这正是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建议。■

艾斯沃·S·普拉萨德（Eswar S. Prasad）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本文基于国家经济研究局第17497号工作论文“国际金融中的角色转换”，在2011年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上提出，来自堪萨斯市联邦储备银行。

参考文献：

Kose, M. Ayhan, and Eswar S. Prasad, 2010, *Emerging Markets: Resilience and Growth Amid Global Turmoil*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Lane, Philip R.,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07,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 Revised and Extended Estimates of Foreig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970–200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73, No. 2, pp. 223–50. (Databases are updated regularly by the authors.)

土地销售

拉古拉兰·詹瑞、罗德尼·拉姆查兰

放松信贷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暴涨暴跌，一个世纪前美国耕地价格可以为其提供一些线索

放松信贷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当泡沫破裂后是否会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最近美国及其他国家房价暴涨暴跌，使决策者们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由于担心最近的金融危机是由于放宽信贷导致的，许多国家正努力紧缩信贷政策，避免银行体系存在过度风险。央行不仅要处理通胀问题，还要反向操作以预防资产价格及信贷规模上涨的观点较以前更受到追捧。

事实上，对于那些依靠商品出口的国家，其决策者正面临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困境。过去10年中，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许多制造商都经历了信贷规模及资产价格一起上涨。例

如，巴西的信贷规模与资产价格曾一起飙涨，并且有人认为虽然美国经济疲软，但耕地价格已出现泡沫。

决策者应如何把握信贷供应与资产价格泡沫及其影响之间的关系呢？信贷政策是政府可以影响的。最近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泡沫的破裂促使这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回顾一下20世纪早期美国耕地价格暴涨的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经验。当时的特色监管也有助于理清信贷供应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信贷供应

经历过金融恐慌的人一直认为

20世纪早期，美国的土地价格经历了暴涨和暴跌。



信贷供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及泡沫破裂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子很多，从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郁金香热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等(Kindleberger和Aliber,2005年)。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研究也指明了信贷供应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对土地等资产的正面影响因素，如土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价格上涨，会提高借款者的资产净值，这就提高了土地拥有者的借款能力，同时放大了对土地的需求。如果是价格下降，如因为商品价格下降，土地价格下降意味着借款者资产净值下降，抵押品价值下降，借款能力下降，土地需求萎缩。减价出售更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下滑(Fisher,1933年；Bernanke和Gertler,1989年；Kiyoutaki和Moore,1997年)。

银行贷款的动力也会影响价格暴涨暴跌这个周期。当信贷扩张时，银行不会因害怕损失或惜贷而停止呆坏账续贷(常被称为永久贷款)或不放新贷，这正是银行对信贷质量没有进行合理评估的表现(Rajan,1994年)。所以，经济繁荣时期容易导致信贷过度。相反，因为经济萧条时更容易出现呆坏账，信誉良好的贷款机会有限，所以银行在经济萧条时会压缩信贷，并将损失归咎于经济环境而非评估能力不足。所以，信贷政策一般会随资产价格波动而变化，

上涨或下跌均是如此，尤其是在银行竞争充分的地区。

理论与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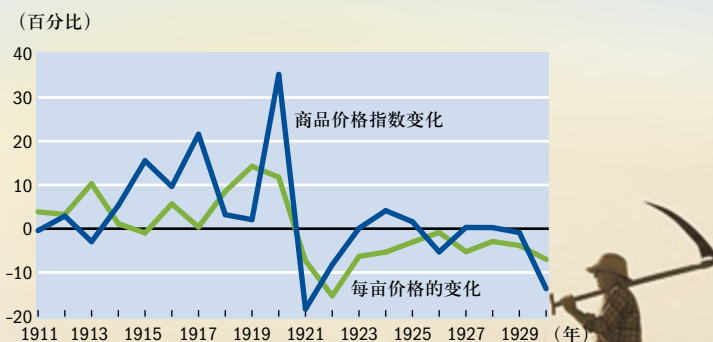
这是理论。而实际上，信贷供应对推动资产价格超过其基本价值以至于产生资产泡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资产价格暴涨暴跌都主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或信心，经济基本面好的国家信贷较为宽松，这也使决策者难于对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及信贷扩张作出反应。提高利率或限制信贷规模增长可能不利于资产价格反应积极的基本面。但信贷供应过于宽松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超过基本面，最终为泡沫破裂埋下隐患。

例如，过去10年中住房价格上涨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普遍相信住房会不断升值。这也使银行认为他们的抵押贷款规模合理，使决策者更难提前判断住房贷款是否过度或信贷是否过度扩张。同样，目前商品价格暴涨的原因也有许多，一般情况会认为结构性转变史无前例。现在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工业化推进，全球气候变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这也推动了美国耕地及商品价格上涨。

为更好地理解信贷供应对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影

商品助推价格高涨

在20世纪早期，世界商品价格的飞涨同样导致美国耕地价格的快速上涨。



响，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一次，即1900—1930年美国土地价格暴涨暴跌的过程，虽然时间上来说已经有些遥远了。20世纪初，美国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工业化进程助推了世界商品价格暴涨。随着美国、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采用汽车等新技术产品，对橡胶、石油及粮食的需求骤然上升（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 2007年；Yergin, 1991年）。正如今天，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同样推动了美国耕地价格上涨（见图）。

20世纪20年代银行破产率最高的地区恰恰是那些当时银行数量最多及一战时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地区。

银行业繁荣

银行业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由于信贷容易获得且成本较低，正如刚刚过去的这次住房价格暴涨的情形一样。借款者只需首付10%，向银行贷款50%，余下的可以进行二次或次级抵押。而还款是典型的末期整付，也就是说贷款到期（即全部本金到期）以前只付利息。只要再融资没有困难，借款者就不担心第一次还款。由于地价长期上涨，贷款者并不担心借款者的还款能力。因为即使他们没能力还贷，银行可以轻而易举的出售作为抵押的土地。所以他们愿意放贷：而每亩土地的抵押贷款在1910—1920年的10年间上涨了135%。一战和俄国革命影响了商品供应，尤其是小麦和石油，更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进一步推高了土地及商品价格。

而一战很快结束，正如其爆发时一样。俄国新政府由于急需硬通货，所以很快恢复了出口。欧洲在农业生产恢复上的速度也比预期要快。所以，世界商品价格在1920年时达到高峰之后，整个20年代都在下滑，最终在大萧条时期崩盘。而美国耕地价格下跌轨迹也非常类似。到距第一次高峰20多年的二战爆发之前，价格再也没有上涨过。整个20年代，美国有6000多家银行破产，相当于1920年顶峰时期的20%，这是在大萧条之前的不景气情况。

根本不同

我们采用了县级层面的详细数据，包括耕地价格、粮食种植亩数及当地银行体系结构。这种微观层面的数据更有利于清晰地分析基本面，即本县种植粮食的普遍价值、土地的附加值以及本地银行竞争中的贷款

条件，找到了信贷供应决定资产价格的双重作用本质。

经济繁荣时期，信贷供应确实有利于土地价格反映经济基本面。有银行及信贷的地区，土地价格更能反映经济基本面——通过这个县每种粮食的种植亩数与七种粮食世界价格变化的指数来衡量。此外，由于土地购买属于大笔开支，贷款能促使土地有效分配，产出多的农民更容易获得贷款，购买更多土地。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银行分布较多的地区，尤其是银行间竞争激烈的地区，土地价格越来越与经济基

本面不一致（至少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这符合另一个观点，即信贷扩张的环境中，银行不会因担心遭受损失或在有竞争力的地区失去市场份额，而放弃不良贷款或停止发放新贷。所以，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可以导致信贷过度扩张，放大对资产价格的冲击。

尽管我们选取的数据相对具体，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一些对土地价格及银行位置起决定作用的地理及人口统计变量，论据选取一些能反映银行竞争与土地价格间其他关系的统计相关。例如，银行数量也许可以反映每亩粮食价值、商品价格震荡幅度或其他可观察量所不能反映的基本面。

更令人信服的论据

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信贷市场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信贷政策对土地价格有独立的作用，这为我们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论据。20世纪早期，美国禁止跨州银行贷款。如果银行数量反映与土地相关的经济基本面，那么无论是在同一州还是不同州的邻县的银行数量，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这个县的土地价格。位于不同州的两个邻县经济基本面一般较为相似。

但是如果银行数量能反映信贷供应，与这个县处于同一州内的邻县的银行（因为此时可以跨县贷款）较位于不同州内的邻县的银行数量更能影响这个县的土地价格（因为此时不能跨县贷款）。

同样，两个不同县的土地价格差距应与这两个县银行数量差距呈正相关，但如果是分处于两个不同州的县，这种正相关更为明显，因为银行不能跨州放贷，所以两个县的土地价格无法趋同。对于以上结论，我们有充足的论据证明，信贷供应的确可以影响资产价格，且影响作用甚至大于经济基本面本身的变化。

跨州间银行监管的不同也会决定银行与价格间的

关系是否会反映信贷供应或一些不可衡量的因素。有些州有存款保险体系。一些著名的论断表明，设计不合理的存款保险体系可能错误诱导银行为高风险的投资提供资金，且信贷发放范围比授权的范围更广。尤其是一些银行是在存款保险制度下运作且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与这些观点一致，数据显示在繁荣时期，如果一个县所在的州有存款保险体系，信贷供应会比没有存款保险体系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银行与土地价格的关系在不同的存款保险体系下，差别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于一个位于由存款保险体系的州的县与一个没有存款体系的州的邻县来说，虽然大家认为这两个县的经济特征相同且种植的粮食作物基本相同。

商品价格崩盘

一战后，世界商品价格崩盘对银行体系总体造成了严重破坏。但 20 世纪 20 年代银行破产率最高的地区恰恰是那些当时银行数量最多及一战时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地区。当然，信贷供应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其一定会推动泡沫破裂。实际上信贷容易获得的地区对泡沫破裂有缓冲作用。但泡沫破裂前信贷供应量大的地区，因为资产价格以及相关借贷增长幅度很大，所以银行破产数量显然更多（主要来自耕地借贷的损失）。总之，这些结果表明，由于银行间竞争导致的信贷供应，可能放大了商品价格波动对土地价格及借贷的影响。一旦繁荣时期短暂结束，信贷供应量大的地区由于信贷规模增长可能导致更多银行破产。

所以，事后来看，限制信贷可能会对防止损失有很大作用。但监管者当时无法后视。而且，在繁荣时期，如果要求整个国家都限制信贷未免过于简单。毕竟，许多地区信贷供应有利于价格反映经济基本面。而且，即使一战结束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欧洲恢复农业生产的速度很快，俄国急切恢复出口，土地价格上涨的预期也是理性的。

另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信贷供应规模更大会使金融体系和资产价格对所有基本面震荡更为敏感，无论是短暂的还是永久性的。大胆的风险管理可以简单理解为逆周期调整。如果一些地区可以预见经济基本面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则应对该地区使用更有针对性的监管工具。

这种解释的必然结果是，大胆的风险管理要求对整个银行体系仔细监测，包括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对冲基金和发放信贷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的资料可以看到，1920 年繁荣时期监管者对土地价格上涨及银行竞争范围认识了解非常有限。即使

是 20 世纪 20 年代银行系统崩盘时期，银行破产信息也相对较少，美国只有一些国家及州银行的监管者有所了解。例如，当时的一个研究表明，监管者要从美国一个地区一些抽样银行中收集数据就需要一年的时间（Upham 和 Lamke，1934 年）。信息匮乏也可能是决策失误的一个原因，例如，鼓励快速出售破产银行资产，可能反过来打击土地价格，加重危机。■

拉古拉兰·詹瑞（Raghuram Rajan）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Eric J. Gleacher 杰出服务教授），罗德尼·拉姆查兰（Rodney Ramcharan）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这些观点不代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方观点。

本文基于“剖析信用危机：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农业用地价格的泡沫与崩溃”，可在以下网址获取本文：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raghuram.rajan/research/papers/land_sales_5.pdf。

参考文献：

- Bernanke, Ben, and Mark Gertler, 1989,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March), pp. 14–31.
- Blattman, Christopher, Jason Hwang, and Jeffrey Williamson, 2007,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Commodity Lottery: The Impact of Terms of Trade Growth and Volatility in the Periphery 1870–1939,"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2 (January), pp. 156–79.
- Fisher, Irving, 1933,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 Vol. 1 (October), pp. 337–57.
- Kindleberger, Charles, and Robert Z. Aliber, 2005,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Investment Classics).
- Kiyotaki, Nobuhiro, and John Moore, 1997, "Credit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April), pp. 211–48.
- Rajan, Raghuram G., 1994, "Why Bank Credit Policies Fluctuate: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May), pp. 399–441.
- Upham, Cyril B., and Edwin Lamke, 1934, *Closed and Distressed Banks: A Stud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Yergin, Daniel, 1991,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是否出售？

《僵尸经济学》 的作者约翰·奎 金探讨私有化的 利与弊

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是 21 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政策的主题。

尽管进行私有化的目的和形式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但都是旨在削弱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加强市场和价格机制的活动。私有化运动反映出人们认为在资本分配当中，金融市场机制优于政府调控这一观点。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问题，许多有关私有化的理论和基础政策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接受旨在减少公共债务的财政紧缩计划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出售国有资产，欧洲就是这样做的。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不断在发生变化，因此私有化本身是好是坏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对于是否应该出售国有资产这一问题的唯一通行的答案就是：“看情况”。在所举例子中要考虑是否进行私有化，应首先在历史背景下对其政策进行分析。

全球性现象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进行的经济活动扩张迅速，这主要是由于国有化和建立新的政府企业所导致的，这样做的原因是认为私人部门的供给不足。然而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末出现了逆转。

在英语国家，英国在这场逆转当中首当其冲。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政府倡导的私有化计划表明摒弃了过去对政府在混合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共

识，而这一共识被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混乱所终结。

除了出售已有资产之外，撒切尔政府还倡导了一个全新的由私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方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公私合营（PPP）。在一个典型的公私合营安排中，私人企业在长期合同下修建和经营诸如学校和医院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而有关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服务由政府提供。

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间，随着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倒塌，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之前，这些国家所有的大型企业和大多数小企业都是国有的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是遵循中央计划调控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部分此类企业转为私营。

在发展中世界，通过出售资产私有化运动得到了强化，而出售资产是 IMF 和其他国际机构所资助的结构调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有化进程在 21 世纪头 10 年放缓，因为政府的那些容易出售的资产已经没有了，而且较早之前的私有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或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出现在英国的那些问题。随着一连串严重的火车事故和不断出现的有关安全与绩效的问题，政府再次国有化路网公司（Railtrack，私营国家铁路网络公司）。几年之后，通过公私合营安排，部分私有化的伦敦地铁网络因一个负责地铁营运的私人公司的管理不善而深受其扰。和铁路网络一样，伦敦地铁也再次被国有化。最近，在国家层面负责公私合营事务的英国私



人融资方案受到了议会成员的强烈谴责，包括政府的大臣们。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呼吁不要明显增加公共负担，而现实是私人投资者在这些项目建设中要求以高回报率（通常大大高于政府债券利率）来偿还高额债务。

暂时的逆转

私有化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即出现大逆转。国家政府出手相救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国有化，或含蓄或明显。有趣的是，这些银行当中的一部分正是曾经拥护私有化的领军者，有些甚至在归国家所有之后仍然继续支持私有化。在美国，这一逆转不仅发生在银行，通用这一长期以来被看作私营企业象征的公司也被暂时国有化，以避免倒闭。

然而，随着主权债务问题的出现，私有化又再次被提上日程。出售资产似乎成为政府筹集资金最为便利的方法。与此同时，有关私营和国营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的经济层面的争论仍未解决，然而由于金融危机而形成的经济理论的挑战又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倾向于私有化与反对私有化的论证都不少，但总的来说，私有化为处于困境的政府提供现金来源这一论据是最常见的。但是，这一论据并非如其所说的那么明确。出售资产会即刻产生经济利益，但这要求政府放弃这些资产本身会产生的收益或者提供的服务。

显然，出售资产获得的收益是否高于所放弃的收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以这样考虑：如果将出售资产所获得的利益用于支付公共债务，将其与国家继续持有该资产所产生的利益进行比较。二选其一，但要相等的，我们可以将一个项目产生的未来收益折合为现值收益，然后减去公共债务利率。如果出售资产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放弃的利益的现值收益，那么私有化的结果则优于政府的财政状况。

有两个因素会对此类活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一个公司分别在私有和国有的状况下的经营效率。一般来说，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经营得更好。然而，如果市场有更多的规则——涉及垄断或外部性问题，则私人所有的优势将大打折扣，甚至消失。

第二，承担适当的风险时的相关资本成本。一般而言，即使考虑到违约风险，政府仍然能以更低的本借债。这部分节约的成本可能高于或低于私人企业

的经营效率获利。

不过，私有化相对而言很少遵从这一简单的验证方法。在对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私有化进行分析研究后，我发现只有位数极少的私有化能够增加公共部门的净值（Quiggin，1995 年和 2010 年）。撒切尔政府着手进行的私有化运动在那个时期受到了广泛的赞扬，然而就对公共部门净值的影响而言，其效果是最糟糕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以仅仅 37 亿英镑出售英国电信公司 50% 的股份，而在那时其每年的税前收益为 25 亿英镑。

公共部门受损

私有化使得公共部门净值减少的原因有很多。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英国电信公司的案例），出于政治的原因，政府有意低估资产的价值。尤其是在公开出售企业的股份时，政府常常为了确保所发行的股份能募足，同时购买者不希望由于股票价格的下跌而蒙受损失。这两点加起来导致了价格被低估。

更糟糕的是，在前苏联的某些情况下，私有化进程受到了损害。多数情况下，由少数人控制着巨大的资产，而公众却获得的回报却极少。这是进退两难的情况。一方面，让一个腐败的、不负责任的政府经营公共资产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让这样的政府出售公共资产，将会再一次造成更大的损失。

但是，即便政府积极寻求公共造成的市场价格，降低债务的收益往往不能与放弃利益的成本相匹配。问题是，投资者一般都要求比政府所发行的优质债务更高的股权资本回报。这种差别被称为“股权溢价”，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股票的高回报率是由于它的高风险的事实。对被称作股权溢价之谜进行的 25 年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其存在的原因。

在大多数经济部门，股权资本的高成本往往超出了私人企业运营更有效（因此，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盈利性更强）这一事实。然而，国有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并经常拥有垄断力量并需要承担更多的外部性规则，不论其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润的

空间有限，以更低的价格把资产出售给私人反映了股权投资者对更高回报率的追求。

何时奏效

有时，把出售公共资产作为增加收入的方法是奏效的。

首先，和大型机构一样，政府的目标和目的已经改变。在某一情况下有用的资产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例如，美军的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但越来越专业，对于陆军基地的需求减少，某些已经被关闭和出售。合理管理资产才是有效的，而不应考虑其是私有的还是国有的。

其次，有些企业在国有的状态下不能盈利，这也

许是由于诸如雇佣和解雇人员的政治约束所致，但是其可以被出售给私人，后者不受这些约束的限制。在此类情况下，有明显的财政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应该思考这些约束是否是国有制所固有的，以及结构改革是否能够将其从私有或国有中分离开来。

最后，如果政府处于如此困境，不能再为其优质债务以现

行的低利率借贷的话，则出售能获得收益的资产往往是奏效的。由此产生的利益高于所放弃的利益。在此情况下，私有化以甩卖的超低价格进行，而这并不是最佳的方法。一个更好的选择是，诸如 IMF 的国际贷款机构为其提供流动性，当其进行有效的调整（包括出售资产，当其通过了利益—成本测试时）的情况下。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大量改善其财政状况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仅仅是从账面数字而不是经济现实来考量的。支持私有化的经济论据认为其能导致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商品和服务分配、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以及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这一论据的有效性和基于市场失灵的辩驳，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美国救助通用公司之后，而在几十年前，英国也同样救助过劳斯莱斯。这类在竞争市场上经营且没有特别的政策要求的企业并不归属于公共部门。在事情正常发展的情况下，面对



英国伦敦诺丁山门地铁站。

严重的财务问题，这类企业应该早就破产了。然而，鉴于其标志性的地位，政府愿意用公共资金来冒险，让它们继续存在并经营。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救助取得了成功，并且企业也再次回到了私有状态。

没有竞争

不过至少在发达国家，这类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发达国家中多数的国有制情况反映了在竞争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匮乏或者缺少需要调节的这一特征。各类基础设施服务通常都是国有制的，其原因如下：

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美国救助通用公司之后，而在几十年前，英国也同样救助过劳斯莱斯。

- 这类企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公共部门的低成本借贷。

- 技术设施服务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在某一地区只需要一个电力网络、供水系统等等。这意味着即使是私有制的情况下，也需要广泛的监管，因此就变成了在一种政府干预形式与另一种形式之间的选择。

- 在多数情况下，诸如道路网络，很难或不可能以反映社会真实成本来定价。

然而，将成本巨大的基础设施不进行投资对于多数政府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收费公路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收费公路计划从账面角度看是不错的，但从经济角度来讲确实失败的。仅仅拥有一个大型道路网络的一部分的相关风险意味着私人投资者对高回报率的追求。以收费收入的贴现现值衡量，收费公路项目通常是由公共债务融资修建相同道路的成本和汽油税或其他道路间接使用者收费服务的两倍多。

此外，收费公路的价格模式通常与经济学的分析所显示的结论相悖。对使用特殊道路进行收费最主要的结果是导致拥堵的加剧，而拥堵正是经济学家支持征收交通拥堵费（正如伦敦市中心的做法）的原因。但在这个例子当中，伦敦的道路是最古老和最拥堵的。对一条新建的、并不拥堵的道路征收费用往往会增加老路和本就拥堵的道路的交通流量，有时还会抵消道路项目的净收益。

医疗卫生和教育

有关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类的服务，存在分离的问题。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服务主要由政府资助，并由公共机构或私人非营利组织（通常是基于宗教）提

供服务。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普遍存在问题，特别是教育，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成功。

在这类案例中，其问题是没有真正的市场。作为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对象的病人和学生很少直接支付他们所消费的服务。而这类服务的提供者在由政府 and 保险公司创造的伪市场上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焦点集中于盈利性，且私人所有者追求的不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寻求在系统内博弈的机会。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常常进行成本转移，精力集中于有高回报的服务，同时把成本高昂的情况推给公共部门。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提供者能发掘助学

金和学生贷款系统的弱点。

鉴于市场激励机制的弱点，只有具有强烈职业道德和专业服务的机构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类的服务。但并不能寄希望于现实中一定存在这种职业道德，就算有，也并非完美无缺。因此，在实施管理控制以提高效率的同时要保持服务的职业道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经验表明并没有可替代的选择。

随着技术和社会效益优先权的变化，此时适合公有制的活动在彼时可能成为私有化的候选者。反之亦然。金融市场的问题或者新技术的产生可能要求政府对先前由私人企业进行的活动加以干预。

总之，私有化作为有效管理公共资产的一项政策工具是有效的且重要的，但其必须与在需要的情况下进行新的公共投资的意愿相匹配。作为政策项目，大规模私有化的理念已经获得了一些巨大成功，不过其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达到了极限。通过出售能产生收益的资产来减少净债务几乎没什么效果。应关注的中心焦点始终是在公私部门之间达到平衡。■

约翰·奎因（John Quiggin）是昆士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Quiggin, John, 1995, "Does Privatization Pay?"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No. 110 (2nd quarter), pp. 23-42.

——, 2010, *Zombie Economics: How Dead Ideas Still Walk Among U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何为计量经济学？

利用一种经济理论并对之进行量化

山姆·奥利阿里斯

通常，经济学家通过建立经济模型来阐述反复发生的相互关系。这些经济模型将单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相互联系在一起（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号，“什么是经济模型”）。例如，经济学家将个人在消费品中的支出额与可支配收入和财富联系起来，并认为随着可支配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将增长（即这种相互关系是正相关）。

通常有很多模型可以解释这种被称之为“经验规律性”的反复发生的关系，但很少有模型能够提供有关这种关系大小的有用提示，但是这对政策制定者却非常重要。例如，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各国央行官员必须了解官方利率的变动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率的潜在影响。在此类情形下，经济学家会求助于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利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推理对经济现象进行量化。换句话说，计量经济学将理论经济模型转化为对制定经济政策有用的工具。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将定性描述（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属于正相关”）转化为定量描述（如“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美元，消费支出将增长95%”）。计量经济学家（专业从事计量经济学的人员）负责将经济理论学家开发的模型转化为可以估量的形式。正如 Stock 和 Watson（2007年）所指出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经济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如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学中都有应用”。如果没有计量经济学分析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就很难作出经济决策。

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经济数据的某些特征使得经济学家很难对经济模型进行量化。与物理学的研究人员所不同的是，计量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开展对照实验——在这种实验

中，仅有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并测定出实验对象对这种变化的响应程度。相反，计量经济学家是利用由相关方程式组成的复杂系统所生成的数据来估算经济关系的，在这种复杂系统中，所有的变量都可能同时发生变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数据中是否由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模型中的未知数。

计量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组成部分。

理论计量经济学家是通过分析现有统计检验和统计程序的属性，估算模型中的未知数。尽管经济数据本身具有一些特殊性——如发展趋势同时发生变动，理论计量经济学家还是希望开发出新的有效的（或功能强大的）统计程序。理论计量经济学严重依赖于数学、理论统计学和数值算法来证明新的统计程序可以得出正确的推断结果。

与之相反的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则是利用理论计量经济学家开发的技术，将定性经济描述转化为定量描述。由于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与数据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经常遇到——并且提醒理论计量经济学家注意——一些数据属性会导致现有的估算方法出现问题。例如，计量经济学家可能发现，数据的方差（一个数列中的单个数值与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大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工具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正规的方法，在考虑到被解释的变量（即因变量）的所有其他决定因子的影响的前提下，可估算一个经济变量（即解释变量）的变化将对因变量造成何种影响。这种量化非常重要，其原因在于在考虑到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后，回归分析希望能够估算出某个特定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见《金融与发展》2006年3月号，“回归分析：经济学家为之着迷的原因所在”）。例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能

在保持其他消费支出决定因子，如税前收入、财富和利率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单独计算出税收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家庭平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开发步骤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简单易懂。

第一个步骤是提出一个解释被分析数据的理论或假设。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规定的变量，每个解释变量及其因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符号和/或大小也明确给出。在该分析阶段，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经济理论来建立假设。例如，国际经济学的的一个原则是，在考虑到名义汇率变动（购买力平价）后，开放边境的价格将同时发生变动。（按照名义汇率变动进行调节后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的经验关系应该为正相关，并且应该大致一对一的同时发生变动。

在实践中，计量经济学也是一门艺术，要求进行大量的判断来获得对决策有用的估算结果。

第二个步骤是确定一个能够把握经济学家所检验的理论实质的统计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特定的数学关系——遗憾的是，往往缺乏有关这种相互关系的经济理论。到目前为止，最为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假定为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某个解释变量的任何变化总会引起因变量的同样变化（即线性关系）。

由于不可能考虑到每个因变量的影响因子，必须在统计模型中增加一个综合变量，才能完成模型的确定。综合变量的作用是代表所有那些无法考虑到（无论是由于数据复杂还是缺乏数据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决定因子。经济学家通常假设，这种“误差”项平均值为零，并且不可预测，以便与统计模型考虑到所有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一假设保持一致。

第三个步骤是利用相应的统计程序和计量经济学软件包，以及利用经济数据来估算模型的未知参数（系数）。由于经济数据很容易获取，加之计量经济学软件出色的性能，这一分析步骤往往是最为容易的一步。计算中著名的GIGO（无用输入、无用输出）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计量经济学。其原因就是可以计算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具有经济学的意义。

第四个步骤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即实施“直觉检验”。估算的模型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能产生在经济学上有意义的预测结果？例如，将因变量与解

释变量相联系的估算参数符号是否与基本的经济理论预测结果一致？（例如，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如果统计模型预测收入增长时家庭消费支出下降，该模型的有效性就将存在问题）。如果估算参数没有意义，计量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改变统计模型才能产生有意义的估算值？更有意义的估算值是否会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步骤将尤其要求和考验应用计量经济学家的技能和经验。

检验假设条件

第四步主要的工具是假设检验，在这个正规的统计程序中，研究人员将对某个经济参数的真实值作出具体的描述，并进行统计检验，确定估算参数是否与假设条件保持一致。如果结果与否，研究人员必须放弃该假设条件，或者重新设定统计模型，并重新开始整个分析过程。

如果上述四个步骤都进展顺利，其分析结果将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可用来评估一个抽象经济模型的实证效度。该实证模型也可用来建立预测因变量的方式，从而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有关调整货币和/或财政政策的决策，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算经济关系的能力常常令计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惊叹不已。计量经济学的以下三个基本原则必须引起注意：

- 首先，参数估算的质量取决于基本经济模型的有效性。
- 其二，如果将相关的解释变量排除在外，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参数估算值很差。
- 其三，即便计量经济学家确定了实际产生数据的过程，估算参数值与产生数据的实际参数值相等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不过，由于估算值从统计学上讲随着可获取数据的增加将更为精确，这些估算值也会被加以利用。

从理论上讲，计量经济学通常可以产生正确的预测结果，但必须借助科学完善的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实证模型的确定。一方面，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拥有已得到公认的规则和程序将模型用于经济数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计量经济学也是一门艺术，要求开展大量的判断来获得对决策有用的估算结果。■

山姆·奥利阿里斯（Sam Ouliaris）是基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Stock, James H., and Mark W. Watson, 2007,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Addison-Wesley Series in Economics (Boston: Pearson Addison Wesley, 2nd ed.).



修补欧洲经济 货币联盟的缺陷

欧元区的长期
存在需要根本
的决策转变

弗洛伦斯·吉莫特

欧元区在第一个10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使成员国之间能够保持较紧密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在北欧较富裕国家资金注入的援助下，欧洲较贫穷国家加快了经济追赶进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显著成功使许多国家忘记了一些最初的疑虑。这个联盟真是一个最好的货币联盟吗？这些国家是否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危机，而不用求助于汇率或独立的货币政策呢？在货币联盟内，经常项目失衡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呢？

这些问题以咄咄逼人之势出现。许多国家在庞大的公私债务和濒临崩溃的房地产市场面前束手无策。私人

资本抽逃的速度要比注入的速度更快。压力已经外溢到欧元区其他的国家，使决策者忙于应对更加广泛、迫在眉睫的危机。

这一现状提出了两个疑问：问题是怎么出现的？怎样做才能阻止这些问题再次发生呢？

成功的负担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运作几乎非常出色。在货币联盟筹备阶段，一些国家通过改革以获得加入这一俱乐部所必需的财政和通胀标准。这些政策的改进和通胀风险的消除将减少欧元国家的借贷成本，有助于所有国家实现

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前悬挂的欧盟旗帜。



财政的可持续。在许多欧元区国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较高经济增长时期，欧洲非核心国家经济趋于增长的前景吸引了大量资本。

然而，较低的利率环境导致一些非核心国家出现过度借贷和通胀泡沫，欠其他欧元区国家债务不断累积而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这些国家将所借资金用于生产（包括出口部门）并不为过，但许多资金流入房地产投资、其他非贸易部门、家庭和政府消费。由此所引发的国内需求增长导致较高的工资和报酬水平，使这些国家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力下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生产链也蚕食了许多欧洲非核心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

失衡扩大

国家政策和制度、金融市场以及缺少合适的欧元区政策协调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

首先，决策者采用了非常短视的做法。一些政府继续疯狂支出（例如，希腊以及稍逊的葡萄牙），加剧了由于贷款流动所带来的国内需求提升。在其他情况下，政府没能通过建立充足的财政盈余和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控制日益膨胀的私人需求。就像经常发生的一样，由于超规模房地产部门和税收收入膨胀所导致的临时性支出增长，被误认为是预算定位的永久增长，并被用于资本税收削减和支出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这些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生产和劳动市场的结构通常有助于工资和报酬的过度增长。尤其在非核心国家，服务业部门有限的竞争使公司索要高价，由于增加工资而导致的成本上升能够通过较高物价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公司同意大幅增加员工的工资。在工业或地区层面社会合作者之间的工资讨价还价通常不能充分说明整个就业和竞争层面工资需求的影响。普遍存在的工资与通胀挂钩，也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持续高通胀。

第三，金融市场没能利用市场规则。尽管非核心国家不可持续增长模式越来越多和外债日益增加，但金融市场以及监管者到2007年年中前只给予了很少的关注。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在此期间全球风险规避行动的减少——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只被看作遥远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风险更大的投机行为。而且，随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即将成立，人们相信经常项目失衡没什么关系，“稳定与增长公约”（SGP）——欧盟保持预算赤字稳定和检查公共债务的机制，将足以阻止危机。

第四，由于欧元区适当的协调政策失败，导致失

衡出现。“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一直贯彻实施，甚至没有受到一些最大国家的重视。欧元区没能监测并实施“稳定与增长公约”，导致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财政联邦制度没有取得进展可能也是出现失衡的部分原因——货币联盟缺少很好的消除区域经济失衡的手段。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和最近提出的欧元区财政当局应当在风险分担和加强监管方面采取建议，因提出得太晚而无法阻止当前的危机。

最后，金融部门的监管政策协调不够，很难发现过多的未回收放款或借贷。更严格的欧元区范围的银行监管有助于避免非核心国家经济泡沫的出现。

修复货币联盟

关于如何实现一个运行良好货币联盟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最佳货币区理论强调在没有国家汇率和利率手段的情况下，将工资和报酬的灵活性、劳动力流动性和财政转移作为调节杠杆。工资和报酬的灵活性使一个国家能够通过降低相对其他国家的工资或报酬，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利的经济影响并重新恢复竞争力。劳动力流动使人们能够向经济增长更快的地区流动，经过精心设计的从较强国家向较弱国家的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调整顺利进行。

但最初的争议仍主要集中在单个国家应当如何适应不利影响，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数年时间凸显另一个挑战——在货币联盟内如何阻止国内需求泡沫。这样的泡沫会产生并不希望出现的长期后果：随之而来的在货币联盟内很难逆转的工资和报酬上涨，债务清偿的泡沫使一个国家面临一旦信用下降再次融资的风险。

这提出了专门针对货币联盟的另一个挑战——如何在不用汇率缓冲器或国家贷款方作为最后手段的情况下，化解针对单个国家的投机性攻击。

四个必备条件

对于这些新的和旧的挑战，要实现欧洲运转良好货币联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 严格的财政纪律。改革必须加强国家层面的财政纪律，并促进更为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使用。欧盟在2011年秋通过了经济治理改革的一揽子政策（六个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向：限制支出增长；使那些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债务上限



60%的国家启动额外赤字程序；通过更迅速、半自动的制裁加强执行力。然而，新的措施没有极大改变实施负责任财政政策的激励作用。为确保拥有足够防御能力的财政要求，应当考虑以下措施。

- 在国家层面的制度法律方面，应嵌入结构平衡预算制度，如德国最近所做的。

- 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管，包括通过反有效多数而启动超额赤字程序（这一决策程序意味着欧盟委员会评估取得胜利，除非部长理事会通过有效多数作出其他决定）。一个更有力的措施是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联合确定，使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上限国家的预算遭到欧元区财政当局的否决。

- 采用一个欧盟层面的财政自动转移体系，以抵消暂时的特定国家影响。不用利率控制手段，将国家支出和税收政策作为规范国内活动和冷却过度需求的主要工具。一个欧盟范围的系统将有助于国家在经济状况较好时节约更多资金，由于政府收入中暂时性上涨的部分将转为中央预算，而不用为难以逆转的主要支出增长融资。由于各国能够从转移中受益，在经济衰退期，各国拥有财政扩张的空间，而不用进一步增加其债务。

2. 一个更为有效地抗击危机的工具。欧元区需要一个共同的防御体系，以保护单个国家免受投机性攻击，而不用破坏财政纪律的激励作用。

在新建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下（该机制将随后成为欧洲稳定机制），一个成员国能够通过担保或贷款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但目前只投入了有限的资源，使人们增加了对新的应急基金有效性的疑虑。

短期来看，在欧元区面临信任危机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将发挥更大作用，使整个货币联盟保持货币条件的一致性。但这同时也面临障碍。欧洲中央银行介入可能会削弱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并破坏独立性和可信性。长期而言，共同的欧元区债券（连带责任以及国家政府将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担保）是财政融合方面一个具有吸引力和可信的方案。

3. 提高竞争性。报酬和工资的设置必须着眼于保持或维持竞争性。目前，着眼这一目标，在根本改革欧元区劳动力和生产市场方面还做得不够。

2011年秋实施的新的“过度失衡程序”旨在监控竞争性和债务，确保各国采取适当的反应并迅速解决新出现的失衡，但这一程序有效性的条件目前仍然缺乏。由各国领导人制定的旨在增强竞争性和就业的欧洲附加条约，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危机管理工具应当更为积极地利用，以针对体制改革提供金融支持，通过联合欧盟—IMF调整项目获得金融支持国家的案例越来越多。

一些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制度要比其他形式更有助

于调整。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注意维持竞争性，并采取责任共担等措施，一般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和增长。

在公司层面完全分权化，或者由国家协调制定工资水平似乎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尤其是当工资没有与通货膨胀挂钩时。对所有工人给予适当的就业保护，消除雇佣或解雇的障碍也同样有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充分的就业补偿将帮助工人重新培训并获得新的工作。劳动力市场改革应当与更强的竞争力相互补充，尤其是在非贸易部门避免国外竞争。

4. 欧元区广泛的金融安全措施。尽管当前危机引发了一些资金缩减，但随着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立以及汇率风险的消除，欧元区的跨国资本流动极大增加。制度必须与具有较高联系的金融系统的现实相适应，并需要打破脆弱的公共财政和脆弱银行之间的逆向反馈圈。欧元区水平强有力的监管必须关注过度放款或银行系统的扩张。银行不能再被视为纯粹的国家机构：需要制定一个欧元区范围的危机管理途径和方案，并需要一个可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的共同基金。

金融方面的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可能是最大的，这归功于新的欧洲监管机构负责协调微观审慎的监管，并主持建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以负责欧洲层面微观审慎的监督。然而，改革进程和举措必须更具雄心，应在制定单一规则手册、欧洲清算局、联合存款保障和清算项目方面取得更快进展。

最后，应当消除阻止股权流动的障碍。由于私人投资者比例的减少，股权流动缓冲了危机的影响，减轻了债务人调整的负担。统一的金融监管和较少的国家经济保护主义将有助于促进跨国的股权流动。

总之，解决当前问题并预防出现新的失衡，除采纳最近提出的完全内部化货币联盟限制条件等措施外，还需在欧元区和国家层面实现根本的决策转变。只有这样，17个成员国才能安全收获欧洲共同货币的全部红利。■

弗洛伦斯·吉莫特（Florence Jaumotte）是IMF欧洲部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即将公布的IMF员工讨论记录“欧元区的失衡：如何预防复发”，作者是Florence Jaumotte、Fabian Bornhorst、Anna Ivanova、Yuko Kinoshita、Hanan Morsy、Esther Perez、Thierry Tresselt、Irina Tytell、Jérôme Vacher、Sebastian Weber和Johannes Wiegand。

贫困人口的保护措施



俄罗斯诺威俄瑞恩盖的石油天然气工厂。

尽管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经济下滑，但过去10年间，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却增长显著。对于那些主要依赖大宗商品收入的国家而言，上述价格增长会带来巨大财富，政府可将其用于消费或储备以及减少赤字。

尽管诱人，但这笔资金的花费却是个问题。如日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笔消费很可能就得作出大幅削减。根据大宗商品收入决定消费方式，政府也从实质上将全球经济波动引入了本国经济。

更为稳妥的方式是政府使用额外收入减少债务及增加政府资产。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这种途径。如石油出口国挪威和铜出口国智利已经取消了短期大宗商品价格浮动和政府支出间的关联。上述两国已使用相应的财

务法案对支出和/或税收进行限制，以维持财政秩序和减少财政波动，这经常是以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措施。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方法。过去10年间，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见图，左图）和俄罗斯（见图，右图）已将政府债务从GDP的100%减少到GDP的10%。债务减少帮助他们经受住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即在不使其长期可持续性债务陷入危机的前提下，两国均保持或增加了无息政府开支（含社会支出）。

尽管从政府财政上看，存储而非支出大宗商品收入可能是更好的财政政策，但这真的代表民众将从中受益吗？经济学家早就指出，评估经济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评估其对经济发展或福利事业的影响。对出口基本天然

大宗商品出口国
可减少债务，保
护其贫困人口

埃文·坦纳、
乔治·雷斯特雷波

资源——石油或矿产的国家，我们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见专栏）来对其替代性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上述模型允许我们采用真实经济信息，模拟不同经济政策或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震荡”）对经济的影响。在对一些国家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出口大宗商品的为国有公司，这就使得公共收入直接与大宗商品的命运联系起来。影响国家出口价格的外部震荡也将直接影响政府预算。

我们发现，最为稳妥的方法是建立财政法规，将政府开销与长期经济状况进行绑定。但是我们同时发现，保护贫困人口免于经济波动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建立法规，促使政府积累一定的财富，以便在经济低迷时期资助那些变得更为贫困的家庭。我们将其称为结构性盈余法规。

经济繁荣与萧条期的财政支出

模型中，我们假设政府支出大宗商品收入，从私人领域购买商品和服务。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及选择何时支出收入，即通过出口收益随时间推移进行分配的方式，政府成了将出口收入转移到私人机构的通道。

在此模型中的一种政策选项是，政府单纯在获得大宗商品收入时进行支出。这种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繁荣和财政衰退交替出现：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支出增加，而仅在价格下跌时对其进行削减。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实质上将全球经济波动引入了本国经济。

这种经济波动不会以同样方式影响所有家庭，较为贫困且无没有机会获取金融服务的家庭对这种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最为脆弱。我们假设，依赖工资收入（或

更为不稳定的收入）的贫困家庭在收入来源中断时，由于无法借款并且没有足够的积蓄来保证他们度过难关而无法解决其日常开销问题。事实上，即使在经济较好的时期，某些贫困家庭仍需要政府援助。经济萧条期，这些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显著下降——特别是在他们的收入下降的同时，经济衰退迫使政府减少对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员的救济。

面对这种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的情况，还另有选择。政府可以将财政支出与长期（而非当前）出口价格进行绑定。

而对于其他阶层，波动性政府支出对其影响相对较小。拥有进入资产和信贷市场机会的家庭——即所谓的“优势型消费者”——可以自行应付上述经济波动。但是不太富裕的家庭需依赖政府的公共政策，以保护自己免受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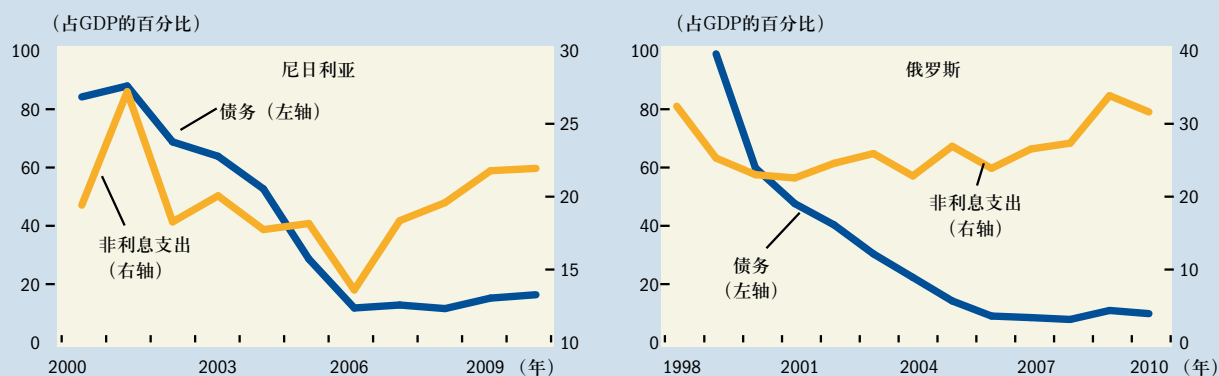
赢家和输家

面对这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的情况，还另有选择。政府可以将财政支出与长期（而非当前）出口价格进行绑定，这样可以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政府均可以有更为稳定的支出。

上述政策可以通过财政法规的方式实施，以对政

减少赤字

尼日利亚和俄罗斯利用经济繁荣期大宗商品的价格优势来减少政府赤字在GDP中所占比例，同时也在经济危机时维持或增加开支。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9月。

注：债务为政府一般债务总额。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模型中有两类客户：优势型消费者（通常被称为“李嘉图”，指拥有可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并且能够借款和储蓄的人）和勉强糊口型消费者（指那些无法进入上述资本市场的人）。勉强糊口型消费者将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全部用于支出，较之李嘉图型群体，他们对市场波动的承受能力更为脆弱。

上述两类家庭的成员供职于生产中间体产品（还需进一步加工）和最终消费品的工厂。因为市场竞争机制尚不

完善，工厂靠成本盈利。只有当工厂收到对工资和价格表进行调整的信号后，它才会对其作出调整（Calvo, 1983年）。这些工资和价格变化导致短期内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当政府消费其出口收入时，将会从雇佣家庭劳动力的同样的工厂中购买商品和服务。这样，政府就会将出口收入间接地传递到其选民手中。如果政府开支使用不均衡的话，优势型消费者家庭（而不是勉强糊口型家庭）可通过借贷方式抵消上述政策性波动产生的影响。

府支出和/或借款进行限制。某些情况下，完善的财政政策可以支持财政纪律并减少经济动荡。但是财政法规不能消除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松动的基本制度，如：一味地对选民献媚、而让未来几代人买单的短视政府。某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已成功实施了与我们的提议类似的财政法规。如，尼日利亚已明确将长期参考价格与政府支出绑定（Okonjo-Iweala, 2008年）。俄罗斯政府框架要求，当石油价格超过某一水平后，将收益置于稳定基金内，禁止用于消费（Balassone、Takizawa和Zebregs, 2006年）。但是，我们所考虑的议案需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量身制订。除此之外，我们的模型也考虑到一次性（暂时性）震荡对资源价格的影响，人们不会期望它在短期内消耗殆尽。当大宗商品价格发生永久性变动或资源在不久的将来会消耗殆尽时，应对上述模型作出修正。

第一步

但是简单地将长期大宗商品价格和政府支出相绑定可能只是保护民众免于经济波动影响的第一步。为了提高其选民的福利，政府应替民众着想，采取一些个人无法实施的行动。为了保护其最为脆弱的民众免于经济波动的影响，政府应为其存储相应的生活保障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可采取结构性盈余措施，不仅要明确解决支出问题，同时也要削减赤字，储备资产。上述措施实施后，债务国的财政状况将稳步提高。在某一时间，政府将从债务国转而成为债权国。根据这一措施，政府开销与持有资产相绑定。政府持有的资产越多，支出也可逐渐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积累速度减慢并最终停止，此时政府资产达到最大。

拥有这样一个有界限的资产储备，政府就可以在严重经济萧条，甚至是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且无法销售债券时维持支出。因此经济萧条或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时，政府也不会被迫削减关键性安全净支出。

相反，在结构性盈余政策下，政府可以通过持有资产保证其安全净支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结构性盈余措施较其他经济法规能够更好地保护勉强糊口型消费者。政府可通过一个实质上代替他们所做的预防性存款计划以帮助其解决消费支出问题。

优势型消费家庭不会受益于结构性盈余措施从而会解决政府的支出问题。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上述努力完全没有必要，如果需要，他们可以从世界货币市场借款并且能够积累自己的预防性资产。

另一方面，上述经济政策甚至还可能会使优势型家庭的收入减少。在政府积累资金的过程中，其支出水平将会由先前较低水平而稳步增加。在这一上升时间曲线的初始阶段，政府积累的是本应由最优家庭获得的资金。因此，较之其他经济法规，优势型消费家庭在结构性盈余措施下所获得的投资机会较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较为宽松的结构性盈余措施的框架下，整个社会都将获得最大益处。为解决优势型群体的福利问题，政府可以制定经过修订的结构性盈余法规，通过允许经济繁荣期政府支出略微增加，以及采取更多层次的长期消费政策，允许一些外部波动因素进入本国经济体。■

埃文·坦纳（Evan Tanner）和乔治·雷斯特雷波（Jorge Restrepo）为基金学院的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Carlos Garcia、Jorge Restrepo和Evan Tanner所著“波动世界的财政措施：基于福利的方法”，刊登于《政策模型日报》2011年7—8月。

参考文献：

Balassone, Fabrizio, Hajime Takizawa, and Harm Zebregs, 2006, “Managing Russia’s Oil Wealth: An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Expenditure Paths,” in Selected Issues, Russian Federation, IMF Country Report No. 06/430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p. 3–43.

Calvo, Guillermo, 1983,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2, No. 3, pp. 383–98.

Okonjo-Iweala, Ngozi, 2008, “Nigeria’s Shot at Redemption,”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45 (December), pp. 42–44.



低于表象的价格波动

拉巴赫·阿尔扎基、丹尼尔·莱德曼和赵洪岩

位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的一家钢铁工厂。

与大众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大宗商品的价格较工业产品更为稳定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其从低产能领域转移到高产能领域。大宗商品或初级商品一般被认为属于低产能领域；而制造商品或二级商品则被认为是高产能商品。在历史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的规模会收缩，而非大宗商品的规模则会增长（Kuznets, 1966年），尽管这其中也会有一些例外，例如挪威，但经济发展与大宗商品相对规模之间的这种显见的一致关系说明，如果经济对大宗商品的依赖性减弱，并进而向其他产品——多为制造产品——进行多元化发展时，这种经济发展将走向成功。

发展经济学家列举出了几种支持上述经济多元化的理由。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在于工业产品价格较大宗商品价格更为稳定，这是可以感受到的。对消费者、商业交易和政府而言，价格波动将影响生产效率，导致生活更加艰难和带来不确定性。我们的研究却不支持上

述观点。总体工业产品价格指标较大宗商品更为稳定，但是当上述指标分解为单项商品指标时（工业产品项目大约有18000种），情况却截然不同。

单一工业产品价格通常较大宗商品价格更易波动。很少有发展中经济体推出许多新产品，所以他们只是单纯地从一种变动大的商品转移到另一种商品。大宗商品走向多元化具有充分的理由，不过控制价格波动绝不是原因之一。

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趋势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可能是最古老、最著名的多元化理论（Frankel，讨论了所有相关的理论，即将发表）。这一具有争论性的假说认为，由于相对于全球收入的变化而言，全球对基本商品的需求不会发生与之成比例的变化。因此，从长期来说，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与工业产品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相比会

呈现下降趋势。如经济学家所述，这种非弹性现象表明，1%的收入增长将导致不足1%的原材料需求量增长。这种假说与恩格尔定理形成呼应。恩格尔定理认为，当一个家庭更加富裕时，其用于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就会减少。如果这一假说（由阿根廷的保罗·普雷维什和德国的汉斯·辛格各自独立研究提出）成立的话，它是不赞成专业化生产自然资源的。

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如果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属于最古老的经济多元化理论之一的話，那么大宗商品价格对工业产品价格的对波动则属于最新的理论之一。Cashin 和

价格波动可导致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如失业、注册资本的利用率不充分以及房屋居住率不充分。

McDermott (2002 年) 提出的研究认为，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的价格趋势完全被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所支配。

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波动最大，紧跟其后的分别是铝、香蕉、咖啡、铜和糖等等。人们通常使用综合物价指数对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大量工业产品价格进行对比。如图 1 所示，多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波动大于工业产品价格指数的波动。工业产品价格来源于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司计算的美国进出口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因为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先进性确保其在所有商品系列上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美国

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基本上涵盖了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所有商品——因此，我们使用基于美国贸易数据的价格指数。图 1 表明，专注于原材料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所面临的价格波动远远大于专注于工业产品出口的国家。

价格波动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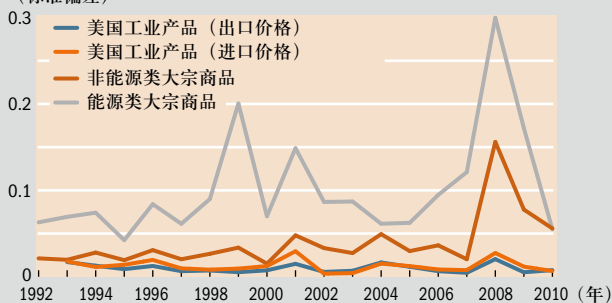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弊端的源头。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在不同领域中转移（如矿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这会导致昂贵的交易成本上涨。价格波动可导致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如失业、注册资本利用率不充分以及房屋居住率不充

分。价格波动不仅会扰乱家庭以及商业中的储蓄和投资决策，也会使政府部门的支出、税收和货币政策的执行变得更加困难。而价格波动应对政策的失败也会使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周期发生恶化变得更为频繁。

如果没有基础广泛的国内金融部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经济发展将会更多地感受到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真的比工业产品价格更易发生波动，则价格波动引发的巨大经济后果将严

图1
整体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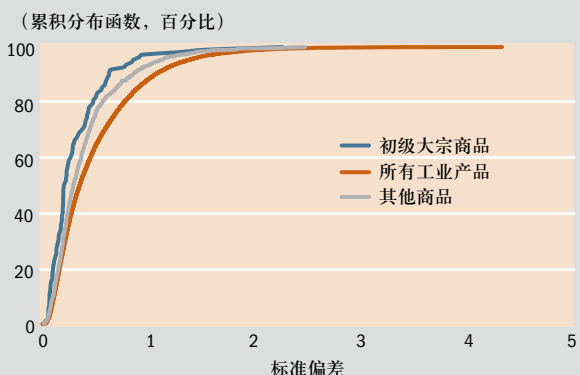
当作为一个整体时，工业产品价格波动远不如整体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大。
(标准偏差)



资料来源：IMF，初级大宗商品价格表；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司，美国进出口指数。
注：标准偏差用于评估价格的波动。

图2
单独评估

如果大宗商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评估采用价格的方式而非指数方式的话，工业产品价格似乎较大宗商品更易发生波动。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司协调系统 (HS)；北美工业分类系统。

注：累积分布函数评估每种商品在价格总波动中所占的比例。标准偏差用于评估价格的波动。价格评估对象为自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的各月价格。HS评估了大约20000种商品，几乎全为工业产品。

重影响专注于大宗商品的国家。

大宗商品的波动来源

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普遍解释是由于其较低的短期需求弹性。也就是说，对任何人为的价格上涨而言，其需求量在短期内不会显著下降，同时供应也不会大幅度增加。这种变化上的延迟主要是因为人们将注册资本设计成总是以一个能源或原材料对产量的特定比例运作。因此，举个例子来说，煤炭价格的增长不会导致短期内公共事业购买量的减少。在短期内，供应弹性一般也会较低，而由于相同的原因，产量调整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当一场冲击来袭时，如粮食欠收（农产品供应减少）或寒冬（能源产品需求增加），结果必然会导致价格大幅上涨以清空市场。一些评论员最近也提出了金融创新纵容投机成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作用因素的观点。这些要素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大宗商品价格在绝对量上是波动剧烈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较工业产品和其他商品价格更易波动呢？

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误解

我们质疑大宗商品价格较工业产品和其他商品价格更易波动的前提。我们使用了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司建立的协调系统中对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20000余种商品所作的详细记录表的月度价格。当对单项商品的价格波动情况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机械类和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最不稳定。

我们随后使用美国统计局北美工业分类系统（NAICS），将商品分为初级大宗商品或工业产品。使用标准统计法，我们确定了哪组商品的价格更易发生波动。如图2所示，工业产品的价格（如用于制造平板显示器的设备等）较大宗商品的价格更易发生波动。

这一结果与图1所显示的信息是矛盾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采用加总的价格指数对不同商品类别的价格上进行比较容易导致加总性偏差。也就是说，某些价格某一方向上的摆动会被其他价格相反方向上的摆动所抵消，这就使得总体指数相比其组成部分而言会表现得更为稳定。当然这一效应也同样体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上，但是大宗商品数目远小于工业



我们的研究表明，专注于制造业生产并不必然减少价格的波动，事实上还有可能导致价格波动的上升。

产品，因此可相互抵消的价格数量也比较少。根据NAICS的分类，我们的数据集中有90%以上的商品为工业产品。因此，使用总数据指数对价格波动进行比较会产生误导。我们需要将上述数据分解并对每类商品进行波动性计算。

可供选择的理论

我们上述数据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与商品是工业产品或大宗商品这一分类无关，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结果显示它们的确相关。

对于我们的研究发现的一个解释是，商品是同质的（例如大部分大宗商品），还是有异质的（例如大部分工业产品）。异质性或者可以解释为何工业产品较大宗商品价格更易发生波动。在我们的样本中，95%的工业产品是异质产品，与之相对应的，仅有35%的大宗商品是异质产品。我们发现同质性商品之间较容易相互替代，因而与异质性商品相比，其价格波动较小。我们采用既有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商品分类，分别对同质性和异质性两组商品内的大宗商品和工业产品进行了价格波动性比较。我们发现，控制了产品的异质性，单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性低于单项工业产品的价格波动性。因此，一件商品是大宗商品还是工业产品，对于决定其相对波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商品分类可能因为重新分类而消失，甚至是迅速消失，如某些商品，特别是工业产品的变动。但是这些变化是否能解释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分类的不完整数据很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中的偏差消失。但是如果将分析限定于整个样本周期内的分类时，我们的主要发现——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小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波动——仍然是成立的。

政策意义

这些对贸易统计结果进行分解而得到的强有力的实证结果对于人们普遍持有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来说较工业产品价格更易波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广义上来说，这一研究结果将会促使人们重新定位对于发展的争论，即从着重于出口价格相对更易波动的大宗商品带来的危害转而关注对将经营活动集中于大宗

商品领域的所具有的隐患。也许正如有些作者所提出的那样，大宗商品领域缺乏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性”正在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形成制约（Hausmann 和 Klinger, 2007 年）。换言之，对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以转为生产非大宗商品将会更为困难。这种困难可能是由于大宗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工艺不同，或者是由于大宗商品领域与其他商品领域之间专有知识“异体受精”的缺乏，或者可能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专注于制造业生产并不必然减少价格的波动，事实上还有可能导致价格波动的上升。并且，专注于制造业生产与专注于大宗商品相比可能更富挑战性：生产工艺需要持续升级以保持其国际竞争性。尽管专注于制造业生产这一选项并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但是政府当局应当时刻牢记对于强有力的创新和适用能力的需求。制造业产品的国内生产也有助于缓冲进口价格的波动。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都会远远小于主要的工业国家，它们也更容易专注于基本大宗商品的出口。它们这种出口模式的集中性与一个贸易不稳定的时期联系紧密，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外部波动和经济多元化的管理政策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挑战性课题。这并不单纯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

拉巴赫·阿尔扎基（Rabah Arezki）是基金学院的经济学家，丹尼尔·莱德曼（Daniel Lederman）是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部的首席经济学家，赵洪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

本文基于即将发表的IMF工作报告《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对波动：重新评估》，作者是Rabah Arezki、Daniel Lederman和Hongyan Zhao。

参考文献：

Cashin, Paul, and John C. McDermott, 2002, "The Long-Run Behavior of Commodity Prices: Small Trends and Big Variability," IMF Staff Papers, Vol. 49, No. 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p. 175-99.

Frankel, Jeffrey, forthcoming,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Commodity Prices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ed. by Rabah Arezki, Catherine Pattillo, and Marc Quintyn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usmann, Ricardo, and Bailey Klinger, 2007,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CID Working Paper No. 14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bisch, Raúl,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Singer, Hans W., 1950, "U.S.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No. 2, pp. 473-85.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2-2013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2.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1, 2012.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批评是正确的吗？

一项新研究发现，当低收入国家获得IMF的金融援助时，其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将增加

野崎雅博、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和圣吉夫·古普塔

IMF 最常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其援助的经济改革项目限制了政府的社会支出。其主要理由在于，受援助国必须缩减公共支出以满足十分紧张的预算目标，而这会使其缩减优先度高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并反过来影响贫困人口。

但研究结果却并不支持上述观点。

我们的近期研究表明，IMF 的援助有助于促进受援国的重要社会支出（Clements、Gupta 和 Nozaki，2011 年）。而其对于医疗卫生和教育支出的积极效果在低收入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

如果宣称 IMF 在其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没有出现过意外，那将是一种愚蠢的说法。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IMF 援助项目与受援国希望增加有助于经济和人文发展的社会支出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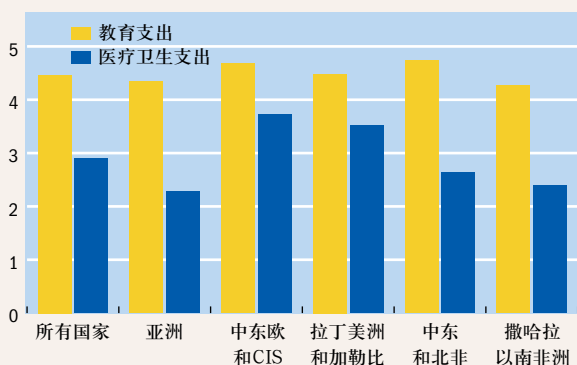
社会支出一瞥

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是新型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的当务之急。教育和医疗卫生公共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5% 和 3%（见图 1）。这些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较大（合计平均约为 25%）。

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在这些领域作出较高投入能够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产出成果（Baldacci 等，2008 年）。同时，过度的政府支出将会导致较高的预算赤字、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经济的低增长。反过来，这些情况也会对教育和医疗卫生指数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国家必须寻求一个位于这些公共事业支出与财政地位维持可持续性之间的正确的平衡点。政策制定者们同时还需要解决那些影响教育

图1
重要事件

教育和医疗卫生在所有政府支出领域中占有重要比例。
(占GDP的百分比)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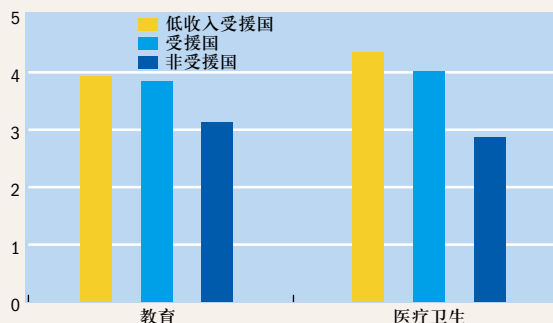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根据Clements、Gupta和Nozak（2011年）所编社会支出数据库的计算。该数据集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data/sdn1115.xls。
注：CIS=独联体。

¹未加权平均数，基于最新数据计算得出。

图2
增加支出

与非受援国相比，受援国，特别是低收入受援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增加较多。

(实际人均支出年度变化中间值，1985—2009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根据Clements、Gupta和Nozak（2011年）所编社会支出数据库的计算。该数据集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data/sdn1115.xls。
注：援助项目样本中的国家仅在获得IMF援助项目的年度被列为受援国样本。在其他未获得IMF援助项目的年度中，其仅为非受援国样本。



柬埔寨暹粒的小学生。

和医疗卫生成果支出效率的无效性因素。

当一些国家因经济的不稳定而寻求 IMF 的金融援助和政策建议时，自然而然就会引发一场对于社会支出改革项目的影响的论辩（见专栏 1）。

新发现

基于迄今为止的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有关此课题的最新综合统计研究为 2003 年——以及过去 10 年间的最新可用数据，我们的研究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答复上述批评家的主张。

我们采用的数据集是此类研究中最具有综合性的。该数据集提取了 1985—2009 年间 140 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数据，其中包括有资格享受 IMF 的优惠金融政策的 70 个低收入国家。因此，我们的研究对 2000 年以来 IMF 项目资助和社会支出变化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与以前的实验分析数据相比，更具有说服力。

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无论是受援国还是非受援国，各个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都在快速增加，

而在包括低收入国家在内的受援国家当中，这种支出的增加尤为迅速（见图 2）。

- 与非受援国人均每年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增长 3% 相比，受援国每年实际人均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约增长 4%。

- 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受益情况最为明显。

- 医疗卫生和教育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在受援国表现的变化更为突出。

其他因素，诸如人口年龄构成、收入水平以及宏观经济条件等，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支出。因此，如果要对 IMF 援助项目的影响进行真正的评估，必须考虑上述因素。通过使用统计方法（见专栏 2）对 IMF 援助项目的影响进行分离，我们又发现，IMF 援助对社会支出具有积极的和统计学意义上的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其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

一个持续性的 IMF 援助周期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提高社会支出在政府支出和 GDP 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对 IMF 援助项目在连续五年内的影响作用进行了估算（见图 3）。其结果显示，五年之后人均

专栏 1

对于批评的回应

批评一直质疑 IMF 援助项目对社会支出的影响（如 Stuckler 和 Basu，2009 年）。以下为经常提及的一些要点和 IMF 的回应（见 IMF，2009a）。

- IMF 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和/或政府赤字，进而导致不必要的预算紧缩。近几年，为了适应高预算赤字和高通胀，援助项目已变得越来越灵活，这点在 2008 年全球粮食和原油价格上涨及 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可见一斑，当时很多低收入国家第一次实施了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 不必要的预算紧缩限制了政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IMF 援助项目越来越强调对社会支出和贫困人口的保护。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援助项目研究表明，受援国的社会支出增加值多于非受援国（如 Gupta、Clements 和 Tiongson，1998 年；IMF 独立评估办公

室，2003 年；全球发展中心，2007 年）。近期，在适用的情况下，针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项目已经包含了最低限社会支出目标（IMF，2009b）。

- IMF 要求限制包括最高工资额度在内的所有政府支出，这可能会阻碍医疗卫生等社会部门的就业增长。2007 年，IMF 引入了一种新的制度来限制上述最高工资限制的使用。其结果为，低收入国家的 26 个 IMF 援助项目均未使用最高工资限制作为业绩标准，且只有两个项目使用其中一项作为一个指示性目标，也就是说，最高工资额度为非绑定条件。

- 从其他发展伙伴获得的用于增长的社会支出的金融援助会转而用于支付国内债务或增加国际储备金。IMF 援助在调动援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努力确保援助资金得到完整而有效的使用。当援助流量发生波动时，政府不会立即使用所有的援助金。这不仅是一种意愿或增加储备金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

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相比五年之前分别增长了19%和41%。但是，我们的分析也表明，这一辅助性支出增长在最初的几年增长最为强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逐渐减少。而这种影响对于那些在这一期间内没有受到持续性援助的国家也相对较小。

通过推动政府加强开支所需收入的改革，以及帮助国家动员捐赠融资，IMF援助项目能够促进社会支出增长。拉动高增长的IMF援助项目有助于创建辅助基金，并能使得较高的社会支出变为现实。低收入国家援助项目将其额外资金来源（包括债务免除所得资金在内）着重用于摆脱贫困项目支出将有助于为教育和医疗卫生带来更多资金来源。

由于在非低收入国的样本中，其促进国外融资和捐款、增加收入和改变支出结构等有助于显著增加社会支出的渠道不如低收入国家给力，因此，IMF援助项目对非低收入国家的社会支出的影响或许更为有限。

为了实现足够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最为优先的任务将是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收入并使公共支出更为有效。这就允许政府在更长的时期内，以一种能够负担的方式增加社会支出。并且，如果能够确保这一支出用于真正需要它的人群，将进一步增强其作为有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的地位。■

野崎雅博（Masahiro Nozaki）是IMF财政事务部的经济学家，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Benedict Clements）是该部处长，圣吉夫·古普塔（Sanjeev Gupta）是该部副主任。

专栏2

工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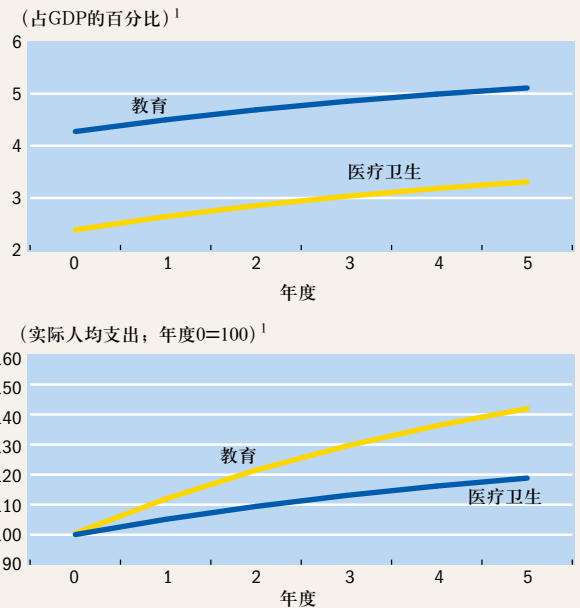
在分析（Clements、Gupta和Nozaki，2011年）中，我们使用了1985—2009年间低收入国家（有资格获得IMF优惠贷款的国家）的年度数据，以对IMF援助项目对社会支出的影响进行评估。我们进行了定量测试，以确定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与IMF援助项目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预算平衡（控制政府的支出可用资金）、人口年龄结构（控制人口效应）和收入水平（通常与社会支出具有正向相关性）等其他直接影响社会支出的因素。

我们还解决了所谓的选择偏差问题。在社会支出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并未直接对获得IMF援助项目的国家与未获得援助的国家进行比较。受援国必须应付的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将会影响其财政政策和政府增加支出的能力。出于上述考虑，我们使用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工具变量”法：我们进行了相同的测试，但是用其他变量有效地取代了IMF援助项目变量，这里所说的其他变量是指那些通常与IMF援助项目联系紧密，但一般又不直接影响社会支出的因素（如国际储备金和外汇汇率制度）。

图3

积极效果

获得IMF援助项目的低收入国家，其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和实际人均支出都出现了增长。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根据Clements、Gupta和Nozaki（2011年）的计算。

¹表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连续五年获得IMF援助项目的国家的社会支出增加（在2001—2009年间的支出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相同）。

参考文献：

- Baldacci, Emanuele, Benedict Clements, Sanjeev Gupta, and Qiang Cui, 2008, "Social Spending,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8, pp. 1317-41.
-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07, "Does the IMF Constrain Health Spending in Poor Countries? Evidence and an Agenda for Action,"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MF Programs and Health Spending* (Washington).
- Clements, Benedict, Sanjeev Gupta, and Masahiro Nozaki, 2011, "What Happens to Social Spending in IMF-Supported Program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1/1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Gupta, Sanjeev, Benedict Clements, and Erwin Tiongson, 1998, "Public Spending on Human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35 (September).
-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2003, "Evaluation Report: Fiscal Adjustment in IMF-Supported Program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9a, "Health, Social Spending Vital in IMF-Supported Programs," *IMF Survey*, October 26. Available at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INT102609A.htm
- , 2009b, "A New Architecture of Facilities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vailable at 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9/062609A.pdf
- Stuckler, David, and Sanjay Basu, 2009,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Effects on Global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39, No. 4, pp. 771-81.

历史回顾



斯尔维亚·纳萨尔

伟大的追求

经济学天才传记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纽约，2011年，558页，35美元（精装）。

在《美丽心灵》这部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传记中，西尔维娅·纳萨尔实现了生活与思想的完美统一，也研究了一个天才脆弱的本质。《伟大的追求》这部书是通过群体传记的方式讲述知识历史的，但没有《美丽心灵》成功。纳萨尔讲述了十几个经济学天才的故事，从卡尔·马克思到保罗·萨缪尔森和阿玛蒂亚·森。她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时代特点”进行了描述，并清晰而准确的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但是这本书涉及的面太大，节奏太过紧张，让人无法把主要的观点合理地统一起来。他们的生活、时代以及想法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人为凑成的，纳萨尔没有将总结概括化，而这些总结有助于阐明问题。此外，还有些环节被漏掉了：例如克努特·维克塞尔和瑞典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阅读本书似乎像经历了一次知识性、历史性的

旅行。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趣，但并没有《美丽心灵》运用的模式成功。

这本书的书名实际上是受到了“人类可以经济需求方面扭转局面，掌握经济规律，控制物质条件，而不是被物质环境所奴役”的启发。正如纳萨尔所说的，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将人们从贫穷中解放出来。从一开始就存在空想社会改良元素，但是这个年代更需要科学基础而不是神学基础（本书中，纳萨尔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描述的早期经济学家的数量上，包括欧文·费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文书背景的琼·罗宾逊）。

纳萨尔一个含蓄的观点是经济学的进步直接导致了物质条件的

虽然经历了这次大衰退及其后续影响，但纳萨尔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

改善。经济学分类中，她最感兴趣的是自由经济还是政府行为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后一种想法的代表，碧翠斯·韦伯应该被包括在内，碧翠斯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即使在经济学家涵盖的范围较广的19世纪也是如此。

纳萨尔描述的那个时代的中心特点是商业周期。那些伟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正是他们所持的经济学观点。在这本书的描述中，约瑟夫·熊彼特是个充满个人魅力的英雄，认为衰退是进步必需经历的一个部分，应该忍受。弗里德曼·海耶克认为衰退并不是必需的，但应该忍受。凯恩斯则认为衰退既不是必需的，也不应忍受。

这个分类中，凯恩斯的观点最接近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认为合适的货币政策既可以预防衰退，也可以治愈衰退。但凯恩斯认为仅仅货币政策还不够，财政政策也是必要的。

如果凯恩斯、费雪和弗里德曼对待上述问题上的观点属于同一类经济学家，在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上，凯恩斯和海耶克也属于同一类。这源于他们对“完善信息”假设的摒弃。熊彼特所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持不同看法一样。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式的英雄人物”是推动进步的主体，正如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引擎。但是他一直认为经济学可以像物理学一样成为一门严密的自然科学，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学习他一直没有掌握的数学。

虽然经历了这次大衰退及其后续影响，但纳萨尔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金融危机暴露了想象中的风险管理原来是自欺欺人的，无论是政治家、银行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是如此。但导致这次危机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可以在《伟大的追求》描述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其中纳萨尔所选的一个天才就是保罗·萨缪尔森，其所著的《经济分析基础》在过去50年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建立模型，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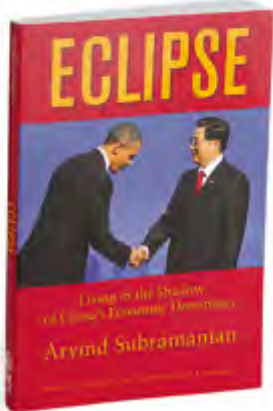
纳萨尔通过讲述这些名人传记事例，反对“数学可能会使其他语言萎缩的担忧”，并指出萨缪尔森的“语言艺术”、约翰·冯·诺依曼的“从狄更斯那里引用了逐字翻译”的能力。但她应明白，这并不是关键所在。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Robert Skidelsky)

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在烈日的照射下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日食

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生活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2011年，216页，21.95美元（简装）。

这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册子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比现在所公认的要更进一步，基础更加广泛，包括产出、贸易和货币等方面”。作者在反思中国是否会放弃重商主义，成为自由贸易的老大，让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储备货币，提倡多边主义，并将其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的最佳途径。作者认为在保持中国经济实力可控制性并建设性地对其进行疏导方面，世贸组织比IMF更为有效，他认为现在应放弃“多哈回合”，开始“中国回合”谈判。正如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一样，当时日本经济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沿和中心，“中国回合”谈判会将中国置于稳定的多边体系中。

这本书是由经济学家所著，但目标读者群非常广泛。该书以事实为基础，本质上富有技术含量，并加以大量细腻的分析。作者没有深度评估随着中国国内对这种中国主导言论的抵制，中国的主导经济实力会如何。如中国专家所了解的，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果这本书将来再版的话，可能会分析203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与19世纪70年代美国以及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的全球经济实力有何不同。但只有中国真正重视民主，才会对世界其他各国具有吸引力，也会增强其软实力。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及世界其他各国，尤其是现在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此书也没有就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开放或美国没有按时对国内经济和财政进行必要调整等可能

风云十年

詹姆斯·鲍顿

《拆掉围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0—1999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2012年，92页，90美元（精装）。

这本书是该系列中的第5册，詹姆斯·鲍顿以一个学者的风格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IMF完整的历史，其中有些片段出人意料。《拆掉围墙》是这个系列的有益补充，此系列还包括鲍顿的《安静的革命》，描写的是1979—1989年发生的故事。

对于研究专家来说，《拆掉围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IMF指南，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可以开阔视野，对IMF有一个整体了解。对IMF员工来说，要了解自己所在机构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也是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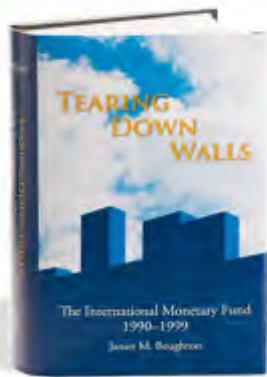
好的资源。

但是由于读者范围广，需求各有不同，有的需要其像百科全书一样的包括方方面面的介绍，有的则需要对重要主题有所侧重。这种题目一般本质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如鲍顿记述IMF在东欧及前苏联的活动时，对前苏联每一个经济体都进行了历史描述，而这并不是那么方便阅读。

作者主要以IMF的档案为记述基础，通过开放的途径及人物采访等完成本书。但是人们想知道这些记述有多少是鲍顿采访对象对这些事件的真实看法，有多少是那些采访对象现在所希望的。

米歇尔·康德苏时任IMF总裁，他在书中被塑造为充满活力、理想远大、不惜牺牲个人名誉的人。康德苏的那位孜孜不倦的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被塑造为当时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人。

但是，除这些人物，其他个人



在整个历史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小。也许对于IMF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官僚政治限制了个人发挥的空间，因此鲍顿对这些人物的强调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真是这样，作者可能会对那些官僚密谋评论更多。

我们听到的各“地区”部门（其对各自负责监测的国家相对而言更为同情）与诸如负责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职能”部门（其一般更为苛刻）之间相互斗争很少。IMF内部一些部门对于接受新观念的没有开放的态度，这是人人皆知的。而职能部门恰恰就是在问题时期人们所

出现的危机，提出应对策略。

我对本书的方法论及一些观点有些质疑，但对大多数结论表示同意，并相信应严肃对待本书所传达的核心信息。中国在一些方面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经济的快速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对国际需求及商品市场的影响力要大于美国，尽管美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依然是中国的两倍多。当衡量美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时，GDP规模（即使调整为购买力平价）并没有增长速度重要。另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将贸易作为一国经济实力的决定因素。正如该书作者所预计的，中国的贸易规模确实庞大，且到2030年时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例会上升至15%（相对于2010年的9.8%来说）。但中国的加工贸易（其所带来的国

内附加值极低）占总贸易额的比例在未来20年内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计算全球经济实力时，加工贸易应与标准贸易所占权重同等吗？我不这么认为。

作者预言中国会开放本国金融管制（人为压低利率及汇率低估），并发展成全球自由贸易的排头兵，以提升本国利益，这个肯定的结论是有争议的。作者根据中国现在努力推动本币国际化，判断中国会取消所有资本管制并推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虽然逻辑清晰，但现实吗？我表示怀疑。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内政治影响力非同小可。金融管制是中国政治体制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核心，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们共同希望作者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因为结束金融管制、将人民币发展为

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是符合中国（及世界）的长期利益的。

彼得·鲍泰利
(Pieter Botteli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高级客座教授，曾撰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

说的这类部门，它们被称为思想警察，当然是一个负面称呼。这是读者希望了解的。

《拆掉围墙》让人联想到柏林墙的倒塌，或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本书引导读者了解IMF如何通过努力提高透明度——拆掉将这个机构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本书还提及了全球化进程中，IMF的角色依然是充满争议的。

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东欧及前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鲍顿将IMF塑造为推动这一进程付出积极努力的适合的机构。基金组织在帮助各国调整宏观经济及结构不平衡方面非常专业，而当时前苏联经济体恰好存在宏观经济及结构强烈不平衡的问题。

但并非所有IMF职员都是了解前苏联的经济学家，这些前苏联国家在围墙倒塌之前并不是IMF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是宏观经济平衡较没有存在过的地区建立市场更难恢复，还有如何管理

大规模私有化。IMF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例如，鲍顿自己提出，基金组织面对私有化问题时屡次迷茫。

本书接着记述了墨西哥、俄罗斯及亚洲金融危机。这些章节有广泛的分析，此外鲍顿对这几次危机的内幕有所揭示。如，我们了解到IMF最早得知墨西哥比索即将贬值的消息并不是通过墨西哥政府，而是通过一个美国政府高官不假思索的话语。我们还了解到IMF没有继续努力阻止俄罗斯违约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正在法国巴约讷度假的康德苏与基金组织驻墨西哥的职员约翰·欧德玲—斯密间的一个误传误解的通话。

这个情节有些地方扣人心弦。读者会对凌晨两点的几次紧急电话留下深刻印象，也会记住IMF官员如何频繁的穿梭于莫斯科与雅加达之间，以挽救世界经济坠入深渊。

鲍顿将1995年、1997年及1998年世界经济情况描述得就如

“雷曼兄弟”垮掉一样近在眼前。回顾20世纪9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非常容易坍塌。人们会问为什么IMF那时不作出更多努力以纠正这些问题。

最后，有些问题在本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如中国、印度、全球失衡、美元的国际角色、欧元的出现。无疑，这些主题是本系列下一本书的中心问题，但也反映出其在这本书中不是主要问题。书中揭示了IMF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也是一个应对机构。其实质是对刚刚过去的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预见新问题。

巴瑞·艾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与政治科学George C. Pardee和Helen N. Pardee教授、IMF前高级政策顾问（1997—1998年）

东非贸易



不断增长的地区间贸易和更低的关税为更加快速的增长铺平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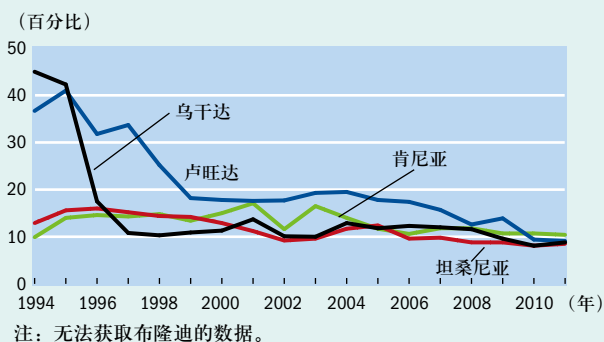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五年间，东非共同体（EAC）内部的低关税促进了地区间贸易，为其五个成员国的快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根据IMF最新的预测，EAC地区在2011年的增长将达到5.9%，大大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

2000—2010年，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地区间出口翻了两番，从约7亿美元上升至20亿美元。在此期间，卢旺达的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从160万美元上升至1.56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与该地区最大经济体肯尼亚相比，仍只是一小部分。肯尼亚对EAC成员国的出口在2010年约为12亿美元。相反，布隆迪（最穷的成员国）的出口增长保持不变且进口出现了下降。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内战、低劣的基础设施，如机场、道路和码头，这些都是进行贸易所必需的。

同时，EAC成员国还开发了新市场，包括地区内的市场。如今，对EAC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同面向欧元区的出口水平相当，紧随其后的是面向非洲其他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此外，EAC成员国的关税总体上已经大幅下降。在过去15年中，EAC地区的关税从1994年的平均

EAC成员国已大幅降低其关税，以达到EAC准入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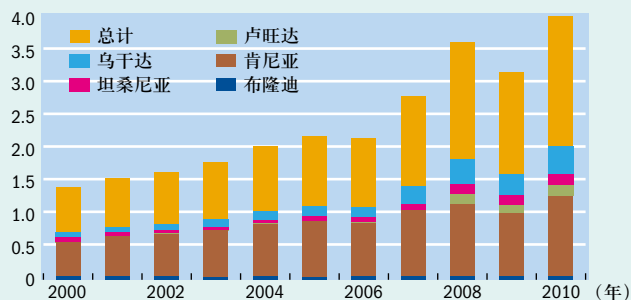


26.1%降至2011年的9.2%（预计数）。但是部分成员国不愿意完全取消关税，因为这样会减少其税收收入。

由于关税的大幅下降以及EAC内出口的快速增长，该地区设定了更高的持续增长水平。然而，要在未来10—15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该地区多数国家的目标），EAC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诸如深入体制改革和减少非关税壁垒。除去这些障碍有助于其经济更加快速地增长以及该地区出口的多样化。

在过去10年间，EAC成员国间的出口增长迅速。

(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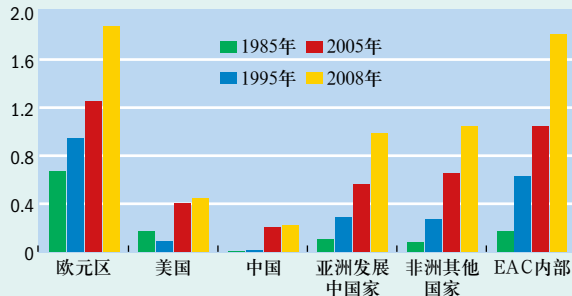


有关数据的说明

有关出口的数据来自IMF“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约187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伙伴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通过www.imf.org/external/data.htm获得相关数据。有关关税率的数据来自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和各国当局。

目前，EAC地区内的总出口已接近EAC对欧元区的出口，位居第二。

(10亿美元)



东非共同体成员国

EAC于2000年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建立，在2007年，布隆迪和卢旺达加入了进来。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国之间的免税贸易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尽管启动缓慢，但在2010年7月建立了该地区的共同市场。

本文由IMF统计部的谢莉·温斯顿（Shelley Winston）和卡洛琳娜·卡斯特罗（Carolina Castellanos）撰写。

A

- S. Ali Abbas, Nazim Belhocine, Asmaa El-Ganainy和Mark Horton, 图表释义: 全球债务史, 3月号
- Yasser Abdih, 缩小就业鸿沟, 6月号
- Ali Alich, 老年“赖账者”, 6月号
- Céline Allard, 更多的欧洲, 而不是更少, 9月号
- Facundo Alvaredo, 图表释义: 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不平等现象, 9月号
- Camilla Andersen, 在变革的世界中反思经济学, 6月号
- Rabah Arezki, Bertrand Candelon和Amadou N.R. Sy, 市政余波, 9月号
- Rabah Arezki, Daniel Lederman和Hongyan Zhao, 低于表象的价格波动, 12月号
- Serkan Arslanalp, Fabian Bornhorst和Sanjeev Gupta, 投资于经济增长, 3月号
- Irena Asmundson, 回归基础: 什么是金融服务? 3月号

B

- 回归基础: 什么是金融服务? 3月号; 什么是经济模型? 6月号;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9月号; 何为计量经济学? 12月号
- Laurence Ball, Daniel Leigh和Prakash Loungani, 一剂苦药, 9月号
- Adolfo Barajas, Ralph Chami和Reza Seyed Yousefi, 获益不同, 9月号
- Alicia Bárcena, 财富分配, 3月号
- Nicoletta Batini和Giovanni Callegari, 保持代际负担间的平衡, 6月号
- Andrew G. Berg和Jonathan D. Ostry, 公平和效率, 9月号
- Maureen Burke, 经济学人物: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9月号

C

- Michel Camdessus, 体系中经验丰富的成员, 3月号
- Jorge Iván Canales-Kriljenko, Luis I. Jácome, Ali Alich和Ivan Luís de Oliveira Lima, 告别动荡, 3月号
- José M. Cartas和Ricardo Cervantes, 数字聚焦: 深入探究, 6月号
- Stijn Claessens, M. Ayhan Kose和Marco E. Terrones, 金融市场的循环周期, 3月号
- Benedict Clements, David Coady, Baoping Shang和Justin Tyson, 解决医保融资问题, 3月号
- Jeremy Clift, 经济学人物: 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 12月号
- Paul Collier, 建立非洲的基础设施, 12月号

D

- Stephan Danninger和Kenneth Kang, 深层震荡, 6月号
- 数字聚焦: 扩张, 3月号; 深入探究, 6月号; 投资去向, 9月号; 东非贸易, 12月号

E

- Nicolás Eyzaguirre, 拉丁美洲国家的稳步转型, 3月号

G

- Tadeusz Galeza, 数字聚焦: 投资去向, 9月号

Atish Rex Ghosh, 经济学人物: 罗伯特·索洛, 3月号

Paola Giuliano, Prachi Mishra和Antonio Spilimbergo, 自由的政府, 良好的政策, 3月号

Maria Gonzalez和Alfred Schipke, 海滩上的银行家, 6月号

H

Richard Harmsen和Nagwa Riad, 贸易场所, 9月号

Thomas Helbling和Shaun Roache, 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 3月号

Neil Howe和Richard Jackson, 服务于养老金领取者: 各国准备好了吗? 6月号

I

Deniz Igan和Prachi Mishra, 交朋友, 6月号

Douglas A. Irwin, 货币的精神, 6月号

J

Sarwat Jahan和Brad McDonald, 获取市场蛋糕中的更大份额, 9月号

Florence Jaumotte, 修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缺陷, 12月号

Jiri Jonas和Cemile Sancak, 财政邻国, 9月号

Calestous Juma, 非洲发展的新引擎, 12月号

K

Philippe Karam, Dirk Muir, Joana Pereira和Anita Tuladhar, 不仅事关退休人员, 6月号

Michael Kumhof和Romain Rancière,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负债, 9月号

L

Ronald Lee和Andrew Mason, 老龄化的代价, 6月号

Eduardo Lora和Carmen Pagés, 直面生产率, 3月号

Prakash Loungani, 经济学人物: 乔治·阿克洛夫, 6月号

M

André Meier, 上涨还是下跌, 3月号

Mário Mesquita, 前程远大, 3月号

Branko Milanovic, 扩大还是缩小? 9月号

Hanan Morsy, 欧洲的失业人口, 9月号

N

Masahiro Nozaki, Benedict Clements和Sanjeev Gupta, 批评是正确的吗? 12月号

O

Atsushi Oshima和James A. Chan, 数字聚焦: 扩张, 3月号

Sam Ouliaris, 回归基础: 什么是经济模型? 6月号; 何为计量经济学? 12月号

P

经济学人物: 罗伯特·索洛, 3月号; 乔治·阿克洛夫, 6月号;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9月号; 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 12月号

图表释义: 全球债务史, 3月号; 降低侨汇成本, 6月号; 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不平等现象, 9月号; 非洲: 放眼未来, 12月号

Eswar S. Prasad, 角色转换, 12月号

Q

John Quiggin, 是否出售? 12月号

R

Raghuram Rajan和Rodney Ramcharan, 土地销售, 12月号

Natalie Ramírez-Djumena, 非洲: 放眼未来, 12月号

Dilip Ratha和Sonia Plaza, 尽侨民之用, 9月号

Carmen M. Reinhart, Jacob F. Kirkegaard和M. Belen Sbrancia, 金融抑制回归, 6月号

G. Chris Rodrigo, 回归基础: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9月号

S

Antoinette Sayeh, 增长的质量, 12月号

Kai Schmitz和Isaku Endo, 图表释义: 降低侨汇成本, 6月号

Abebe Aemro Selassie, 南非的困境, 12月号

Josette Sheeran, 预防饥荒, 12月号

Mark Stone, Kenji Fujita和Kotaro Ishi, 非常规行为, 9月号

直言不讳: 新兴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和新挑战, 6月号; 增长的质量, 12月号

T

Evan Tanner和Jorge Restrepo, 贫困人口的保护措施, 12月号

W

Shelley Winston和Carolina Castellanos, 数字聚焦: 东非贸易, 12月号

Z

Min Zhu, 直言不讳: 新兴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和新挑战, 6月号

书评

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贫穷经济学: 全球减贫方式的根本性再思考》, 6月号

James Boughton, 《拆掉围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0—1999年》, 12月号

Adam Ferguson, 《当货币死亡时: 魏玛共和国赤字支出、贬值和恶性通胀的噩梦》, 3月号

Victor Ginsburgh和Shlomo Weber, 《我们需要多少种语言? 语言多元化经济学》, 6月号

Tim Harford, 《适应: 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6月号

Jeff Madrick, 《贪婪的时代: 1970年以来金融的胜利和美国的衰退》, 6月号

Sylvia Nasar, 《伟大的追求: 经济学天才传记》, 12月号

Tomas Sedlacek, 《善与恶的经济学: 从吉尔伽美什到华尔街对经济意义的追求》, 9月号

Michael Spence, 《下一次收敛: 多极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前景》, 3月号

Arvind Subramanian, 《日食: 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生活》, 12月号

Ben Tarnoff, 《造币者: 三个臭名昭著的假币制造者的邪恶人生和惊人历险》, 3月号

Daniel Yergin, 《任务: 能源、安全及现代世界的重塑》, 9月号

浏览IMF新的 数字图书馆

深入、有影响力、不可或缺



只需轻点鼠标，就可获得IMF数字图书馆带给您的全球金融分析。
该数字图书馆提供您所需的IMF主要出版物、
有影响力的图书、工作论文、研究、数据和统计工具。
从您值得信赖的资料库，获取所需的信息。

登录www.elibrary.imf.org观看演示。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cwillis@imf.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1 -Chinese \$8.00



MFIEA2011004